

# 安那其主义入门



笔者对于经济的问题实在才疏学浅，故此在这本小册子当中，对于经济问题只进行最基本的描述，而不作深刻的剖析，没有金刚钻就不揽瓷器活。在这本小册子当中，经济的基本问题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还有蒲鲁东先生的文献，而政治问题则完全按照安那其主义的视角来进行。虽然有些地方用了列宁所下的定义，但也只是辅助作用而已，让读者能够了解安那其主义的建构是笔者的唯一目的。

有一点需要提出，就是中文学术界对于安那其主义的译名为“无政府主义”，这种译法不对。无政府主义这个译法最早是由日本人提出，中国沿用了这一译名，而近来日本文献中鲜有再用的了，日本学术界已经发现这种译法根本无法表达出安那其的意义，在对于巴枯宁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进行翻译的时候，也采取了『国家制度とアナキー』（《国家制度与安那其》）的译法，这实在是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过，赵京先生也提出了可以把安那其意译为“自由社会主义”。

当人类的知性发达、成熟起来时，我们会发现人类所崇拜的那些“总统”、“总书记”、“主席”、“总理”、“大臣”和 CEO 等所窃取的权势，正是人类理智不开化的象征。畅饮过安那其主义理智之泉，谁还会再欣赏那些用裹尸布制成的形形色色的服务于金钱和权力的嫁妆！在苏联和东欧的畸形共产主义制度已经毁灭的今天，饱受当年共产主义体制摧残的我们这一代人，更应该注重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体制的反思。而不是一味地引用、复读。

另外，我尤其要感谢赵京先生，如果不是赵京先生的诸多文章对我的启示，我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更不可能有这本小册子的诞生。在本书中，处处都存在引自赵京先生的文章，有些地方引用的频繁，没有做详细的注释，望请谅解。此外，也有对于维基百科和诸多文献的引用。

这本小册子第三章虽然写了很多抨击马列主义政府观念的内容，但是本质上都是政府，作者并没有故意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正相反，这种抨击更容易让人看透政府的本质。

编纂草率，疏漏繁多。对于错误的点，请有条件的同志指出并且修改，让更多的人得以涉足、理解，最终认同安那其。

# 第一章：阶级与剥削<sup>1</sup>

提起阶级，可能许多人都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也可能有的人会说出“中产阶级”等牛唇不对马嘴的答案。但其实，“中产阶层”（也有的骗子叫“中产阶级”）等等定义，只不过是资本家欺骗劳动者们的弥天大谎罢了（原因我们下面会进行解释）。社会问题必须要按照阶级视角来看，否则就一定是空话连篇的自欺欺人。

在生活中，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词语，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却知之甚少。有的人可能会说：“无产阶级就是穷人，资产阶级就是有钱人”。虽然这个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完全是正确的。但是，说了这么多，什么是阶级？

阶级就是人的等级。这么说不全对，但差不多。这种等级是在生产过程中的。至于为什么是生产过程中，下面会有所解释。但是，这种等级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它一定是通过社会的运动而造成的。一般来说，划分阶级的标准是占有与不占有（有没有）生产资料。但，什么是生产资料呢？生产资料就是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需要使用的资源或工具。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除了工人这一身力气之外，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比如说种地吧，农民要想有个好收成，他需要些什么呢？他首先需要一块或者多块土地，另外，他还需要种子、化肥、用于杀虫的农药，还有农业机械。那么土地，还有我们刚刚列出的，或者是没有列出的一些必需的东西，就是生产资料。而农民则是劳动者。农民占有土地，因此我们依据他的生产资料（土地）把它划分为农民阶级。

## 1.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那其他的阶级呢？我们慢慢地来讲解这个问题，那首先就应该讲资产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那不就很简单了吗？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我手里有500万的资本，我想要创立一个厂子，这个厂子用来生产各种工具。那我需要准备几笔钱呢？或者说，我要把钱分成几笔投资呢？一般来说，资本家的资本（本钱）会是两笔。

1：用来置办生产资料的价值（钱）。

2：用来雇佣工人的价值（钱）。

有了这两笔钱，我就具备了办厂生产的基本条件。但在这里，我们需要介绍一下这两笔钱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一定是这两笔钱呢？资本家可不可以省下一笔呢？当然是不可以省的。

首先是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包括什么呢？因为我要生产的是工具，就必须要有原料，也就是钢铁。有了原料，我是不可能用手来进行加工的吧？我还需要有工具（或者是机器）。生产资料有个特性，那就是产品中一定包含生产资料的费用。假如我用100斤钢，制造了一百把木柄锤子，那么，这一百把锤子当中，一定包含着钢的价钱。不仅如此，这一百把锤子，还会包括机器损耗的费用，并且包括劳动（工人加工）的费用。

其次，雇佣工人。这个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也会有人提出疑问，假如我不雇人，我自己来加工呢？还需要这第二笔费用吗？需要。设想一下，雇佣工人的费用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用来养活工人的。（如果可以的话，资本家当然不会给工人任何钱，他想的是怎么才能尽量降低工资水平。）如果资本家想要工人还能够继续工作、不至于饿死，就必须给他工钱。工人首先会拿这笔钱用来养活自己，然后他才能去干活。而如果我们不去雇人，难道我们自身就不需要吃喝睡了吗？因此这笔钱依旧是要花的，区别仅仅是花在别人还是自己的身上而已。

<sup>1</sup> 本章虽然用的全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但是我并不想在后面继续用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我认为要想普及经济的基础知识，引用马克思高明的经济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sup>2</sup> 也有的说法认为自己生产产品然后去卖的是小手工业者，我在这本小册子里也把他们当做一种小资产阶级。

那，为什么阶级是生产过程中的等级呢？因为生产资料被资本家占有了。这么说可能不太好懂，解释过来就是说：因为生产资料（工厂、机械）是资本家的，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就被资本家所有。而资本家则靠这些产品去获取利润，至于他到底是赔了还是赚了，和工人没有关系。

但是，为什么资本家能够赚到钱？他的利润是哪里来的？是通过压榨而来的。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分析吧。

假如小明是工具厂的老板，他投资三万，其中1万用来购买钢铁和机械，剩下的2万用来雇工人。那他的资本（本钱）就是三万元，分成两笔，一笔用来购买生产资料，一笔用来购买劳动力（工人）。我们再假如，这些工人每天工作4个小时，一个月就能生产出价值两万的工具。也就是说，每个工作日工作四个小时就能让小明回本。这时，如果小明拿着这些产品去卖的话，他就正好不赔不赚（假如他没有提高价格而是按照工具的价值来卖的话）。

但是，资本家不会让工人只工作四个小时。他会让工人工作8个小时，12个小时，甚至16个小时。假如工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那资本家的利润就翻了一倍（价值4万元的工具）。而如果是12个小时，就是两倍（价值6万元）。这就是资本家赚钱的奥妙之一。

我们简单介绍了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要做个简单的定义了，**资产阶级是一种是投资者，主要靠投资的回报来获得经济利益**。投资是什么？资本又是什么？我们在下面会进行阐述。

**资产阶级又可分为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先说小资产阶级。一个农民可以认为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因为他要对土地种什么东西作出投资决策，他同时也要劳动，也要雇一些工人，他的回报是劳动加投资的回报，并非固定薪水。在城市里遍布的小饭店，小吃店，发廊，小杂货店，这些店主们也是小资产阶级，小本经营，也要雇一些工人。而且我注意到大部分的小资产阶级多年总是维持那么一种状态，十年前他在那儿开发廊，十年后他还是在那儿开发廊，规模即不扩大也没有缩小。

以上就是资产阶级的基本原理，至于更加深奥的，为了简单易懂，这里不做介绍。

那工人呢？工人也是一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就和字面意思一样，是不占有（没有）生产资料的阶级。无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诞生的。

这里假设，假如这个工人以前是农民，他本来可以美滋滋的顾着自己的几亩地，并且还能靠土地的收成过日子，还能活的不错，那他怎么可能会来做工人呢？因此，成为工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工人除了出卖自己一身的力气之外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活下去**。只有在找到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人才能够靠着资本家给他的微薄的工资而勉强过活。上面我们提到了一个词，“出卖”。它的意思就是，工人的劳动力实际上就是一种商品，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售卖的。劳动力和其他的商品一样，会有价格的波动。这就又是个新的概念了，就是工人内部的竞争，稍后我们还会讲述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假设，这个资本家想要雇佣100个工人，而他必须给每个工人一个月3000元的**最低工资（工人正常工作必须的数量）**。但是工人如果仅仅只靠这3000元的工资能够活的很好吗？前面我们也说过了，工人通过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要远远超过这3000元，那余下的呢？余下的价值（财富）就被资本家所占有了。这就是**剥削**。那么，工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提高工资水平吗？能，只不过这有区别。因为工人分为高等的，又分为低等的。而这就是工人内部竞争的条件了。那么假使这个资本家**想要用尽量少的资本来雇佣尽量多的工人**，那方式就很简单了，就是**降低工资**。但是，这是有风险的，因为他很有可能会引发工人的不满。但资本家有自己的方法。他可以在别的地方，在工商业不发达的地方（工商业不发达，工资水平也就或多或少的会低一些），雇佣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工人）。

这样，他就能减少自己投入的资本，而获得更多的价值（利润）。但是，那这些失业的工人怎么办呢？这和资本家完全没有关系。这就是工人内部的竞争，从我们分析的来看，**内部竞争对大部分工人绝对没有好处**。

不过，无产阶级内，也有其他阶级的人啊，也有曾经掌握着某种可以过日子的手艺的人啊。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们全都没有生产资料吗？我们这就来解决这个问题。

假如这个卖手艺的，就比如说他是个铁匠吧，他每天干八个小时（和工厂内的工人一样），一

个月他能够生产出 10 把木柄锤子。很显然，这个锤子和工厂里生产出来的锤子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这个铁匠生产出 10 把锤子的时间，机器可能已经生产出了 1000 把。因此，机器所生产出来的自然比这个铁匠手工制作的更加廉价。但有的人可能会问，那铁匠也引进机器不就得了吗？的确是这样没错，但是，这个铁匠如果能够承担购买机器的费用，又怎么会还继续手工制作呢？或者说，为什么铁匠不一起降价呢？请读者想想，这个铁匠一个月只能产出 10 把锤子，用以维持生计，他自然想要这 10 把锤子都能卖出去，并且利润能够维持他下个月的生产，以便他继续进行生产。但是如果降价了，他是肯定不能靠廉价的 10 把锤子养活自己的。这样，他的生计就没有办法维持了。他的手艺因为机器的普及而变得不值钱了。这样，他除了出卖自己一身的力气之外，没有任何能够活下去的办法了。

资本家呢？也有落魄的资本家去打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前面我们说了，工人内部有竞争，这种竞争对工人绝对没有好处，反而对资本家有益。而资本家内部也会有竞争，这种竞争对资本家也同样是没什么好处的。假如 A 工具厂和 B 工具厂都生产木柄锤子，他们引用的机器是一样的，因此产量也差不多。所以这就决定了两个厂子的产品（木柄锤子）的价格是基本差不多的<sup>3</sup>。这时，两个厂子的老总有两种路可以走：

1: 进行合作，共同提升价格，共同受益。

2: 进行竞争，尽量击垮另一家厂子，独霸整个地区的市场。

从表面上看，正常人都选择第一条路。但恰恰会选择这条路的资本家最少。因为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与其平分市场，不如独霸市场。如果独霸了整个地区的市场，价格就会随自己的定价而动，不需要担心有人搞破坏。有好几种进行竞争的方式，但这里我们只介绍一种。

因为在单位时间内，两个厂子的产出是差不多相同的，所以价格就差不多。不过，有一种很精妙的方法可以赚取更多的利润。那就是引进新技术（新机器，新生产方法等）。这样，假如每个月只能产出 1000 把锤子的机器，采用了新技术之后，每个月可以生产 2000 把。这样，锤子的价值就降低了整整一倍（但仅仅只是对这个资本家来说）！他可以立刻降价一半，用这个方法来冲垮另一个资本家。一旦那个资本家垮台之后，他就会立刻提高价格，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为在另一个工具厂倒闭之后，这个地区的市场上（假设）只有他一家工具厂了，那么民众的消费选择也就近乎没有了，只能买他厂子的工具。这就是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

## 2. 阶级对立不可调和

我们说过，一个工人会尽可能的让自己的工资或多或少地提高一些，为的是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而对于资本家来说，提高工资就好比灭顶之灾了。为什么？想一想，如果工人的工资提高一点，则代表资本家的资本（本钱）提高了，这样他在卖掉自己的产品之后，能够获得的利润相对也就减少了。那么，阶级对立就仅仅表现在工资上吗？当然不是，阶级对立也会表现在工作环境、工作保障（比如保险）等等。如果工作环境改善了，或许工人因为令人厌恶的工作而产生的疾病也就少了。而保险就更是一个很热的话题了：给工人支付一定的保险金到底是不是必须的？站在一个工人的立场，答案一定是必须的，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他人的问题，自己也包括在内。但是对于资本家呢？假如要建造一栋大楼，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 1%（现实中当然不可能只有这么低），到底有没有必要给工人上保险？可能所有的资本家都会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但为什么在工人那里不需要思考，而到了资本家这里就要认真思考了？因为工人与资本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工人想要工资尽可能高一些，而资本家则想着尽量低一些。如果工资降低，工人会受到损失，资本家却获益了。而如果工资提高，工人会获得好处，资本家则不会高兴。

有的读者可能要说：“如果这个资本家是个‘好人’呢”？好，作者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

<sup>3</sup> 单位时间内生产产品的数量会决定产品的基础价格（没有加价之前的价格）。

“好人”这个结论到底是怎么推断出来的？是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吗？是因为他改善了工作环境吗？还是因为他给了工人足够的安全保障？也许这个资本家良心发现了，给了工人上面我们所说的那些。但是，这就能证明资本家是不靠剥削工人而活的吗？**根本不能**。而上面我们所提的各种对工人好的福利，难道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会去反对吗？这难道不是资本家应该承担的吗？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如果没有工人的劳动，难道能自己就变成产品卖出去吗？**一个善良的特例不等于所有人都是善良的**。假如 100 个资本家里面有 10 个良心发现了，难道这 10 个人就能代表那剩下的 90 个人吗？

上面我们说的，就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完全冲突的，完全相反的。如果工人的生活好了，资本家的生活就相对差一点。**如果资本家的生活好了，那他想工人的生活差到什么地步就差到什么地步**（因为工人被资本家雇佣了，自然就必须完全按照资本家的指挥来行动）。

不过，我们在本节当中也只是说明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社会上绝不仅仅只有这么两个阶级，除了工业资产阶级之外，还有手工业者、农民和零细的小工业者、小商业者等等。这些个阶级都共同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尤其是在医疗和福祉等等，包括国企福利逐渐破产的今天，他们也都是受到各层统治者的盘剥榨取的受压迫者。所有的受压迫者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地打倒压迫者，将国王从腐朽的宝座上拉下。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生硬的划分两个阶级的做法是明显不正确的。只有能者，无有贵贱。

一切就像巴枯宁所说的：“不论这个人生性多么温顺，不管具有多么听从于当局的习惯，也不会心甘情愿的服从；要让人们服从，就必须有经常性的强制和暴力，也就是必须有警察监视和军事力量。”<sup>4</sup>

### 3. “中产阶级”之骗局

在第一节中我们说了，所谓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弥天大谎。在前两节我们又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但是，这为什么就说明“中产阶级”是骗人的？

首先，我们要明白，中产阶级是什么。中产阶级就是在被雇佣的无产阶级当中，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中产阶级不是一个阶级，而仅仅只是一个阶层**。为什么？

因为中产阶级是被雇佣的群体当中，工资水平处于中等阶段的一部分群体。所以，**要想他是个中产阶级，他必须先是一个无产阶级**。也就是说，首先这个人必须是被雇佣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可以养活自己。这就好办了，难道工资处于中等水平就能证明他没有被剥削吗？就能证明他被剥削的程度更低了吗？**完全不能**。

资产阶级说的中产阶级，一般都是为了市场。我举个例子：假设这个资本家有一笔 5 万元的资本，他两万用于生产资料，三万用于雇佣工人。这些工人每天工作 4 个小时，一个月就能产出价值 3 万的产品（资本家能够回本的数量）。但是他让工人们每天干 12 个小时，也就是他的利润翻了两倍（假如他能把这些产品都卖出去的话）。但是，在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工人的时候，这些工人拿着被剥削之后的工资，**是根本不能买光价值比他们工资总量多得多的产品的**。首先，工人需要用这些工资的绝大部分去养活家人和自己，其次他才有闲钱去买些其他东西。很明显，货多，但是工人们买不起。这就是产品过剩了，面对这种情况，资本家会怎么办？**资本家宁可把这些多余的产品都倒了、毁了、砸了，也不会把这些产品给需要的工人们**。说了这么多，这和中产阶级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太有了。

为了“解决”产品过剩的问题，资本家们除了毁掉产品之外，还可以适当的提高工人们的工资水平。这样，工人们就有了一定的闲钱去买产品了。但是，就算工资水平提高了，难道工人就不再

---

<sup>4</sup> 至于国家的这些个制度，我们会在下文进行分析。

被剥削了吗？难道他们就可以买光比自己工资水平多得多的产品了吗？

这种“解决”的方法，只不过是纸包火，只能暂时缓解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根本不可能解决。这就又涉及到一个问题了，就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首先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被一个人占有了，生产会被这一个人来组织，也就是说，厂子是资本家的厂子，在厂子里工作的所有人都必须听厂长（资本家）的。并且，因为工厂是他的，所以在工厂生产出来的所有产品也都是他的。

生产社会化：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都因为生产资料的兼并而不得不去打工，工人越来越多，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被剥削，这些人拿着被剥削的工资，是不可能把那么多的产品买光的。

另外，这里我还要说，假如这第一次生产，这个资本家生产了2000套工具，并且全都卖光了。就算这样，他也不可能永远都会卖光。假如第一次生产的产品被人买光了，也就是这个资本家获得了利润，他会在第二轮生产投资更多，市场上的商品也就更多了，更不容易被买光了。假如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都卖光了，他的买卖也就更大了。这样，越来越多的产品，他能够保证永远都能被卖光吗？

以上作者阐明了产品过剩的基本原理。而中产阶级的问题却还没有说完，中产阶级不仅仅是工资提高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假如这个资本家要生产一批工具，他需要雇佣很多的工人。如果这些工人一窝蜂的只干一件事，从加工完成到运输工具全部都有一整批人来做，很显然，效率不会太高，因为这些工人必须掌握从生产加工到运输的一切技术。这样，培训工人的成本也变高了。但是换一种方法，就会很简单了。把这些工人分为几批，这一批去加工生产，那一批去运输。这样就两不耽误，效率也能明显的提高。

不过，这就有关中产阶级了。因为一旦分工，工人就不只是平等的了。掌握技术的工人会想当然的觉得自己比搬运工人高级一些，因为自己干的是技术活，而搬运工干的事体力活。并且，因为这种分工，技术工人的工资也会比搬运工人高一些。在这种生产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中产阶级。上面我们说，中阶级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品过剩的问题。不过，资产阶级绝对不能意识到是剥削的存在导致他们的产品销量不好。中阶级的存在不是他们主动去“解决”的，而是在社会发展中自然产生的。

## 第二章：资本及其衍生<sup>5</sup>

### 1. 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差额中产生资本

什么是交换？假如，我在修理机械的过程中发现我原来的工具坏了，因此我就需要去买一套扳手。“买”就是交换的一种形式。交换有很多形式，在没有货币的时候，是通过以物易物（用东西换东西）来进行的。在那时，如果我想要一些小麦，就必须要用使用价值相同的东西来交换。

产品具有两种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什么是使用价值，什么又是交换价值？首先，假如我需要一套扳手，所以我去杂货店购买工具。当老板把各种各样的产品摆在我眼前时，我首先要看的是什么？是质量，我要看看这套扳手到底合不合适我用，如果合适，就可以说这套扳手对我有使用价值。因为这套扳手对我有用，我就要去买。如果反过来说，这套扳手对我没用，我是不能买没用的东西回来的（不要在这里抬杠，说什么塑料小人之类的东西）。所以，**先要有用，然后产品才能值钱**。

交换价值是什么？在我们现代来说，是产品的价格。我要买扳手，这个扳手对我有用，我要购买就必须付钱，这个钱就是交换价值。不过，价格也不完全等于交换价值，因为资本家在把扳手卖给我之前，是肯定会适当的提高价格的。这高出来的一部分就是杂货店小老板的利润。而且，在商品的估价上，就算老板完全没有加价来赚取利润，**价格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交换价值**，二者绝对不可能是相等的。因为价格与价值之间做不到完全契合，这个问题就给了资本产生的机会。

而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却是一直在变的。我们用粮食来举例子吧，假如这一年是丰年，玉米一亩地能收获 1800 斤。因为使用价值更高了（能够养活更多的人），粮食的交换价值就一定变低（粮食丰收不值钱）。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因为连着几年都是丰年，结果农民的利益反而受损了。而反过来，使用价值变少了，交换价值就一定变高。还是以粮食为例子，这一年是灾年，玉米一亩地只能产 600 斤了，那么，交换价值一定会变高。因为粮食稀缺，会有更多的人争着抢着买。

相信读者一定有个疑问。钱和资本的区别是什么？这里就要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来下定义了：**资本是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换成容易懂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资本是能够产生利润的钱**。区分就在于，假如我有这一万元，我是用来投资还是用来挥霍。如果是用来投资，这一万元就是资本。而用来挥霍，就是货币。

那么，货币是怎么转化为资本的？

前面我说了资本家要想开张需要两笔钱，这两笔钱分别是购买劳动力的和购买生产资料的。而购买劳动力的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缩影。首先需要阐述一下劳动特殊的性格：假如这一批铁锭价值 30 元，而通过我手工打造，造出来的一批工具就价值 50 元，这些产品中不但包含着生产资料（铁锭）的价值，还包含着手工劳动的价值。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就是劳动力的商品化**。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要解释的是劳动力商品化。劳动力变成商品有一些原理，首先，这个工人除了一身的力气之外没有其他养活自己的能力。而且他还必须是一个自由人。

和其他的商品不一样，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有自己的特性，因为其他的商品都是消耗品，而劳动力却是创造力。众所周知，一切的商品都必须通过劳动来加工。就连那些天然的资源，都必须通过劳动来开采，然后才能供人们消费。因此，**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消耗，而是为了创造**。

这个资本家，他想要赚钱的话，就一定要购买劳动力，并且或多或少的剥削工人。这样，他就通过剥削和出售商品获得了利润。

---

<sup>5</sup> 从本章开始，所用的经济问题几乎都是蒲鲁东先生在《贫困的哲学》的理论了。



## 2.分工<sup>6</sup>

从亚当斯密发现了分工开始,所有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的理论中都提到了分工规律的益处和害处,但他们过度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因为这样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肯于反问一下这个规律的害处何在。请看让·巴·萨伊是怎样总结这个问题的:

“一个人一生只从事一种操作,就必然比别的人做得更好和更快;但是与此同时,对于其他的工作,不论是劳力的还是劳心的,他的能力就不免要差一点;他的其他官能便慢慢地衰退,结果就单个的人来说,人类是退化了。一生只从事制造扣针的第18道工序的工人,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那些终身摆弄锉刀或铁锤的工人才这样失去天赋的尊严,即使是那些由于职位关系而运用他的智慧最敏锐的官能进行脑力劳动的人也不免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分工固然是一种使用人力的巧妙办法,它能奇迹般地增加社会的产品;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它又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才能。”(见《政治经济学原理》)

因此,除了劳动以外。什么是财富增长与劳动者熟练程度提高的首要原因呢?就是分工。造成精神衰退和文化贫乏的首要原因又是什么呢?就如我们将要不断看到的,这原因也是分工。为什么把这同一个原则一直严格地贯彻到底竟会产生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是在亚当·斯密以前或以后,始终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发现这是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萨伊虽然已经走到承认分工既产生良好的结果,也产生不良的后果,可是,他接着就只是对行业分工的受害者说上几句怜悯话便就此满足,以为自己就作出了不确不储和符合实情的解释了,问题便这样放下了。

除非改组劳动,消除分工的弊病,同时又保留它的有益作用,否则,分工原则所固有的矛盾是无法补救的。必须按照谋害基督的犹太祭司们所主张的杀一以拯百的原则行事,把穷人灭绝以保护私有主的财产。这个判决之所以必要,我将在下面加以说明;分工的劳动者,只要还有一丝理性,就应懂得自己的死亡是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使然,也庶几得以自慰。

劳动本来应该发挥人们的意识,使人愈来愈无愧于幸福;可是分工的结果却引起智能的衰退,使人体最高贵的那个部分衰退了,造成中枢失灵,从而使人重新沦入兽性。从这时起,堕落的人类就像牲畜一样地劳动,因而理应待之如役畜。作出这个判决的是自然和必然性,执行判决的则是社会。劳动分工在败坏了人们的灵魂以后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与脑力的消耗量成反比。因为产品是既根据效量也根据质量来评值的,所以,如果劳动由于工业的某种进步而在上述的任何一方面缩减了,就必须在另一方面找到补偿。既然工作日的长度不能超过16至18小时,所以一旦不能依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补偿,便只能在工资上下手,于是工资便降低了。这样一来,一个劳动者除了执行屈辱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到摧残之外,还免不了要忍受报酬微薄所造成的肉体的痛苦。

政治经济学开宗明义就对我们说了一句神感而阴郁的话:效用生产得越多(产量),交换能力便越下降;同样,在到了第一站时,他又对我们发出可怕的警告:工艺愈是进步,匠人便愈是倒退。

为了使大家更明确这些观点我们来举个实例。

在整个冶金工业中,什么工工人最没有技术呢?恰恰是人们所称的机械工。自从工具显著改进以后,机械工便成了种只懂得动动刨子或者把零件送上刨床的人。至于机械原理呢?那是工程师和工长的事。乡下的一个钉马掌的匠人,迫于环境往往需要擅长几种活计,既是锁匠,又是铁匠,又是刀剑匠,又是机械工,又是修车工,又是兽医。人民总是很幽默的,他们给这种工匠起个外号叫打铁人,殊不知打铁人的铁锤底下包藏者许多高深的学问,会使文人学士为之惊奇不已!“克勒佐”的一名工人,十年里亲身经历了自己那个行业里最处观和最精巧的技术改道,可起,他一离开了工厂,便成了个对什么活儿都粗手笨脚、无法挣钱糊口的人。人的无能竟与工艺的改善成正比,这种

---

<sup>6</sup> 本节节选自《贫困的哲学》分工一章,别说什么工作日理论抄袭马克思之类的屁话了,因为贫困的哲学发表的比资本论还早。

情况不但冶金业存在，而且所有行业都如此。

分工最显著的一个后果是文学的衰落。

在中世纪和古代，文人都像百科全书那样博古通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愧为骚士墨客的后代。文学高高在上地指导着社会；连国王也要乞求作家的青睐，或者是为了报复他们的傲慢，把他们连人带书付之一炬，可是，这后一种办法归根结底也是承认文学至上的一种方式。

今天，有的只是工业家、律师、医生、银行家、商人、教师、工程师、图书专家等等，而不再有文人了；我们还不如说，谁只要是在自己那个行业里有点地位，那就好像一定是腹有文墨似的，文学有如学位，成了任何这类职业的基本标志。文人二字只能按照字面最简单的意义来解释，成了公共写作者，也就是受雇于众人的捉刀小吏，其中人们最熟悉的就是新闻记者....

### 3.竞争与垄断之关系<sup>7</sup>

#### ①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与垄断市场对立。

公认的自由资本主义是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当中提出的，主张国家对于经济要采取完全的自由放任，国家不能干预任何的经济问题。亚当斯密认为，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这个自私不是贬义），因此他们在处理自己的企业的问题时，要花费更多的耐心和理性。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一书中，主张人们争取自己的利益，大多时候却幸运造成公共的利益。由于交易行为需要双方自愿，因此获利的唯一方法是提供别人愿意接受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合作。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自由放任理论是在 1766 年，在当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完全确立的时候，这一理论无疑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前文我们也说过，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有时会让大多数人受益。但随着竞争的愈演愈烈，总会有一些资本家被吞并或者被淘汰，最终形成了垄断的状况。蒲鲁东先生总结说：“竞争消灭着竞争。”是十分正确的，竞争一方面的确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在另一层面却也能造成巨大的破坏。

竞争是价值构成所必需的，也就是说，是分配原则本身所必需的，因而也是实现平等所不可或缺的。只要某种产品只由唯一的一个制造商来提供，这种产品的真实价值就永远是个谜。或者是他故意隐瞒的，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将成本降得很低。生产上的特权对于社会来说是一种真正的损失；而生产的公开和劳动者的竞争却十分有益。一切已经设想的、或者是现存的社会制度，都不能脱离这个规律。

尽管劳动作为生活、智慧和自由的最高表现来说本身无疑具有吸引力，可是我认为这种吸引力永远不能完全离开功利的动机，从而也永远不能排除利己主义的复发。这就是说，我否认人们为劳动而劳动，就如我否认人们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为爱情而爱情，为艺术而艺术一样。今天，为写文章而写文章已经产生了草率下笔、急就而成和空洞无物的著述；为爱情而爱情导致了鸡奸、手淫和卖淫；为艺术而艺术的结果则产生了毫不实用、滑稽可笑的作品，形成对丑恶的崇拜。如果一个人在劳动中只是为了寻求锻炼的乐趣那么他很快就会停止劳动，干脆玩起游戏来。历史上不乏这种堕落的事例，例如，希腊那样一个全靠奴隶生产的社会的各种游艺，包括伊斯特姆、奥林匹克皮忒克、尼梅等竞技大会。

而马列主义者认为，任何事情都应该区别使用与滥用。有一种有用的竞争，会让人开阔胸襟、提高思想，是一种高尚的竞争，这种竞争就是竞赛。而又有另一种竞争，这种竞争让人相互仇视、互相嫉妒、互相杀害，即利己主义。

他们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就是玩文字游戏，有人说：竞赛并不是竞争。我首先要指出：这

---

<sup>7</sup> 本章的内容也是基本节选自《贫困的哲学》。

种所谓的区分不过是根据原则所发生的不同效果而作出的，结果只会使人们以为真的存在两种原则，人们把它混为一谈罢了。竞赛不是别的，就是竞争本身。既然人们想讨论抽象的理论，那我也愿意奉陪。正如世间不会有无对象的热爱一样，无目的的竞赛也是不存在的；而且，由于人们所好不同，热爱的对象必然取决于热爱者是什么人，好色者爱女人，野心家爱权力，贪财者爱黄金，诗人则爱桂冠，同样，工业竞赛的目标必然是利润。

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私人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之间可以不受限制地展开自由竞争，国家不干预社会经济生活，采取自由放任和自由贸易的政策，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活动完全受经济规律的自发调节。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之间的自由竞争，迫使企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资本在各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和资本不断扩大，从而既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又加剧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 ②垄断

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列宁也将这一阶段称为帝国主义阶段。

不过，虽然叫做垄断资本主义，也并不是说竞争就完全不存在了。垄断虽占统治地位，但并不存在绝对的垄断。不仅自由竞争仍然存在，而且产生了新形式的竞争，即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垄断组织同非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以及垄断组织内部的竞争。在垄断组织之间的竞争中，竞争的手段不只是依靠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降低成本，而主要是凭借各自实力，在掌握本部门的统治权、垄断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垄断交通工具和熟练劳动力、垄断科学技术成果等方面进行斗争。在垄断组织同局外企业进行的竞争中，垄断组织是以剥夺对方所需原料、劳动力、运输工具、销售市场、信贷以及倾销等手段，迫使对方处于屈从的地位。

前面我虽然说过，资产阶级间的竞争有时会给被压迫阶级带来一定程度的好处，但是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可以说就没那么多好处了，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好处。当这些巨商富贾充斥了整个上层社会的时候，资本就开始四处蔓延，其结果就是腐败横行、官匪一家。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我说的是所有形式的国家，而不仅仅特指资产阶级国家，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问题，我们会在下一章详细阐述）而穷兵黩武。从三角贸易到种族灭绝，从一二战到冷战，没有一次国家间的冲撞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的。

有人要说了：“二战的苏联呢？他们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无产阶级军队吗？”唉，这种论调其实一想就能够明白。如果二战的苏军就代表了整个国家的人民（我这里说的是如果！），那么在东欧和德国境内的屠杀和奸淫掳掠又要算到谁的头上呢？难道这种暴行是热爱自由的斯拉夫民族所喜爱的吗？还是说军队又一下子不能代表人民的态度了呢？

再往前说，苏德战争前，苏联对于德国一直持吹捧的态度，声称他们是朋友，是伙伴。这两个纳粹同志还一起瓜分了波兰，好不快活！在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遭受了被背叛的苦闷，只能川剧变脸，一下子在舆论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了。

往前说，有沙俄的侵略开疆拓土；往后说，有苏联打着“解放”旗号的傀儡政权。唉！国家从来也不可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以前没有，现在没有，我相信以后也不会有。

回到主题上来：由于垄断组织实力强大，在垄断条件下产生的竞争要比自由竞争阶段规模较小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剧烈得多，这必然使得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更趋复杂和尖锐。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垄断资本凭借垄断地位已积聚巨额垄断利润，少数最富的国家通过国内外剥削已拥有巨大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但在垄断占统治地位的部门里，获得高额利润的那些投资场所几乎都被占领。

为了追逐高额垄断利润，过剩资本就会转向国外，借以垄断原料来源并带动商品输出。殖民地和附属国经济落后，不但工资、地价、原料价格较低，资本有机构成也低，因而利润率高。这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把这些落后地区卷入了世界市场范围，使这些地区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基础设施也已开始建设，初步具备了投资条件。

垄断表现在很多个方面：

第一，资本集中与生产集中高度发展，在主要产业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中产生了居支配地位的垄断组织。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单一单位企业和在此基础上的分散竞争已经成为历史。主要产业部门大都已形成寡头垄断格局。

第二，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日趋融合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又形成金融寡头。在工业垄断资本形成的同时，银行业的竞争造成银行业日趋集中和银行垄断组织形成。银行垄断组织的形成，使银行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过去的借贷中介人，变成了万能的垄断者，并与工业资本日益融合在一起。

高度的垄断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上面这几段我们也说的很明白了。但垄断不单单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蒲鲁东先生在著作中也说的很清楚：**垄断是竞争的必然产物，竞争通过不断地自我否定而产生垄断。因为既然竞争是社会的一种固然属性，既然垄断是随着竞争而产生的、垄断是竞争的目的和结果，没有垄断，竞争就不会被人所接受。**

不是所有人都能把一条路或者是一部机器当做礼品来送给自己的同胞的，耗尽心血和财产的发明人通常总是期待着酬劳。要是拒绝给瓦特、雅卡尔等人的发明以特权，而且还嘲笑他们，那他们一定宁可关起门来悄悄地工作，也去会对自己的发明秘而不宣，一直带进坟墓。如果你拒绝承认拓荒者对他们所开垦的土地有所有权，就不会有人去垦荒。每一项有益于社会的发明给他的发明人所带来的利益，无论如何总是比给社会所带来的利益少得多。不过，既然如此为什么社会不会倾其所有的支持这些发明人呢？

社会只有避免与个人同级牵连在一起，完全让个人来承担一切革新的风险，才能够维持下去。如果把有益于社会的重大发明罗列在一起，几页纸就可以写完。但是任何数字也没办法表达完失败的发明和错误设想与轻率的尝试。因为任何智慧想要获得一丝半点的理性，就总要先散发出弥漫无际的烟云。有一部分是有益的，而有一大部分则是耗费了时间、脑力、资金和体力的无用产物。假如社会必须要支付这些亏损，清偿这些破产，那它还能叫社会吗？

换到人的视角，如果他有了社会做靠山，自己不冒任何风险，胡思乱想，任意妄为，随时都可以拿人类的生存孤注一掷，那么，他们的责任和尊严又变成什么了呢？类似的例子是比比皆是，最典型的的就是希特勒。

而面对垄断，马列主义者也拿出了他们的处方，便是充公<sup>8</sup>。这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价值都被政府所垄断了，但这一处方毫无用处，如果一切的垄断都被政府一家独揽了，他这一家就要承担起组织所有工业的任务，可是要用什么办法组织工业呢？公众又是什么意见呢？有哪些问题解决了呢？如果工业按照等级制度来进行，那我们就回到了垄断制度；如果采取民主制度，又要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已经充公的工业将重新回到公众手里，就是说又开始了新的竞争，但竞争最终还是慢慢地走向垄断。

上面我们虽然适当的讲了垄断的**些许**合理性，而为了理性的思考，我们更需要说明垄断的破坏力。

“法国分布在科学、艺术和工业各个部门的劳动者有 2000 万，他们都在生产着有益于人类生活的各种物品。假定他们的工资总额为 200 亿，由于垄断者拿走利润(净产值和利息)，全部产品的售价应该是 250 亿。可是，因为一个国家中除了挣工资的和付工资的人以外，便没有别的买主，而后者是不会为前者偿付货价的，同时，商品售价对所有的人又都是相同的，所以，很显然，为了使商品能够流通，劳动者就必须以 5 个法郎来购买只值 4 个法郎的东西。”（见《什么是所有权？》，第 4 章）

正因为这样，所以富裕和贫困不仅在观念上互相关联，不可分离，而且在事实上也是如此。也正因为这样，富裕和贫困才彼此共同存在，使挣工资者有权认为富人拥有的并不比穷人的多，穷人的

---

<sup>8</sup> 这里的充公和安那其主义所主张的充公是不一样的，马列主义推崇公有制，生产资料公家所有。而安那其主张的共有制，是说生产资料由所有人共同享有。

东西并没有被侵占。在垄断者计算了自己的成本、利润和利息之后，挣工资的消费者也要打自己的算盘；后者终于发现在劳动契约然客应给 100 的工资，实际上却只给了 75。因此，使雇佣工人破产的是垄断者说垄断者靠掠夺为生是完全正确的。

分工、机器、净产值和利息互相结合的结果，使垄断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领域。它囊括了农业、商业、工业以至所有种类的产品。大家想必都听说过普林尼在谈到招致意大利灭亡的土地垄断时所说的那句话：**大土地占有制灭亡了意大利**。正是这种土地垄断，使得罗马的农村穷困不堪，荒无人烟，使得英国纷扰重重，永无宁日。

有人说，资本家把双方商定的日工资发给工人，因此他并不欠工人任何东西。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他雇用工人一天，就应付一天工资，可是实际不是那么回事。因为由于劳动者的同心协力、分工合作和协调一致而产生的巨大力量，由于组成工场而获致的生产费用上的节省，以及由此导致的产量的增加，虽然这些都是企业家所预见到的，但却是由额外的力量来实现的，资本家对之并未付出任何代价。例如，200 名士兵在一名工程师的领导下几小时内就把一座方底尖碑修建起来，难道一个人做 200 天就能完成这项工作吗？可是，按照企业主的计算方法，上述两种情况的工资总额却是一样的，因为他把集体力量所创造的利益算作自己的了。这里总是两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他有侵占行为，或者是计算错误了。（《见《什么是私有制》，第 3 章》）

为了使一座纺织厂正常运转，就必须有机械师、建筑师，职员和各个工种的男女工人。这些人在受雇进厂时，总是要代表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安全、自己的未来以及子女们的未来提出某些条件，他们向企业主提出的受雇条件书在哪呢？他们又从企业家那里得到什么保证呢？怎么！千百万出卖自己体力，割让自己自由的人原来是完全不知道合同的重要性；他们是以为能够长期有工作而且报酬又合适才来受雇的；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实现了老板设想的计划，而且通过这种合作成为企业中的联合成员。可是当垄断一旦无力或者不再愿意进行交换而停止制造，以致这千百万劳动者粥饭不继时，人们却劝告他们要安于天命。由于新生产方法的采用，他们十天有九天失业；人们却拿高悬在他们头上的必然的鞭子来威吓他们。要是他们因为工资太少而拒绝工作，人们就给他们证明说这是自作自受；要是他们接受雇主提出的工价，那他们就将失去那种构成自己尊严和幸福并且使自己有权博得富人同情的高贵的自尊心和生活的乐趣。如果他们协议共同要求增加工资，人们便把他们投进监狱。本来应该由他们在法庭上控告剥削者，法庭却反过来给他们加上妨碍商业自由的罪名。垄断的受害者其实是在为垄断者服刑。唉！人类的正义啊！你这个披着女神外衣的宫廷奸佞究竟你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吮饮被戕杀的无产者的鲜血呢？

## 4. 捐税

蒲鲁东先生在他的《什么是所有权》和《贫困的哲学》两本书里高明的证明了国家所谓的捐税是明目张胆的剥削。

政府要维持它的军队（我们会在下面说明军队的作用）、搞一些建筑工程、支付公务员的薪水。为了填补这些资金的需求，就必须征税。政府希望所有人都自愿的交出这些税金，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但是为什么有钱的要比穷人交的更多呢？据说这是合乎正义的，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老实说，这种正义不是我能理解的。

为什么要缴纳税金？政府说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各种权利，比如说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平等权。政府说这是为了在国内维持秩序，他们还说这是为了进行各种公益项目。可是，保卫富人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所花费的，是不是比保卫穷人的花费更多呢？在遭受侵略、饥荒和瘟疫爆发的时期，谁造成了更多的困难呢？是那群不必国家保护就能避开危险的财阀们呢，还是缺衣少食地在茅屋中发抖的穷人们呢？

事实上证明，警察们为了压制几百个失业了的技工所耗费的精力，比应付几十万富豪的精力多

多了。

话说回来了，到底是穷人们享受整洁干净的街道更多呢，还是那群财阀们享受的更多呢？财阀们喜爱乡间的别墅，至于什么公众性的娱乐，他们不以为意。要是他们想要快活，还需要等待国家的项目吗？

国家主流和一般的普通人（他们受到了主流媒体的欺骗）都认为捐税是对于财产多的人进行的一种十分公平的财产分配行为，而国家也会拿着这笔钱去做些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来写个表格吧！然后我们就能一眼看出这种骗局的虚伪了。

我们假定税率为八分之一：

收入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税额	125	250	375	500	625	750

他们说，因为这些富有的人的钱<sup>9</sup>比较多（这些人通过各种剥削的手段，把价值从劳动者手里抢了过来），因此要对他们课重税，来缓和这种极大的不平等。然而却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在税额上的平等，恰恰就是极大的不平等。

税额应该按照什么比例来确定呢？当然是按照特权者超额收入的数额来确定，而不是按照他的收入所占的社会资本的份额。可见，税务机关并不是向占有了这八分之一财富的人去征收这些赋税的，他们恰恰是向需要这笔钱的人去征税的。

所谓“财产再分配”这种屁话，根本没有这个东西，这只不过是国家对于穷人的另一种压迫。而财阀们，他们虽然也交了那点微不足道的税金，却又通过各种巧取豪夺从人民手里拿回去了。换句话说，经济上的剥削一日不灭，这虚假的捐税就一天骑在人民的头上。

作者也想起了清代的一个故事，农户们拒绝交租子，乡绅们只好假惺惺带头交了租子，这些农户受了欺骗，将自己的粮米交了上去。可当官府收好了农民们纳的粮之后，又遣差役去把富户家的尽数还了回去。以示两边合作愉快的诚意。

---

<sup>9</sup> 为了通俗我就这么叫吧。

### 第三章：国家制度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的存在表明，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调节的自我矛盾，即分为两个或多个敌对的阶级，这些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了，如果不用什么办法加以解决或者让矛盾暂时缓和，这个社会就会因为这些个阶级的敌对而毁灭。<sup>10</sup>国家的压迫制度表现在各个方面，我们下面就来进行阐述。

#### 1. 所有权是一切问题之根本<sup>11</sup>

在以政权斗争为中心展开的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更深刻的经济矛盾，如以温斯坦莱为代表的山岳派平民利益，以布朗基为代表的共和平等派的诉求。他们很快明白：新掌权的、以资本为后台的统治阶层马上就出卖了曾经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平民阶层；为了政治权益的垄断，统治阶层甚至完全不顾那些从人类历史保存下来的、同为人类一分子的基本伦理情感。很显然，如果没有新的持续革命，总要维持的人支配人的组织社会必然会堕落腐化下去，这种新的革命，马上就集中到所有权的制度上。

即使最初平均分配土地，经过若干时间，私有制必然引起财产的不平等，社会分裂成几个阶级、社会道德下降，富人阶层必然力图夺取政治统治权、任意修改法律，在贪欲土地的驱使下发动战争.....，总之，私有制不仅破坏了一个社会（国家）中公民之间的和谐，而且也破坏了整个人类各社会集团（国家）之间的安宁。

前面我们也说过了，资本家如果想要剥削一个人，就必须要有生产资料。因此占有了生产资料，他就可以剥削别人了。因此，要想打翻资本主义，还得从所有权的问题上入手。不过，这也不是说就必须顺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谓“公有制”的路子走。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套，我们过去已经使用过了，造成了什么情况也是有目共睹的。

所有权只要存在着，国家就要产生，就必定会有一帮特权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镇压不满自身特权的人。究其根本，国家之所以会存在，还是因为所有权。但是什么是所有权？所有权即占有、使用、收益、处置四权合一。首先是占有，这个东西要放在我这里，不能放在你那里；第二，我可以随意使用这个东西；第三，我可以把它卖了或者出租，来赚钱；第四，我想把它砸了或者送人，谁也管不着。

实际上可能的读者已经明白了，最大的问题出在收益权上面。正是因为这个权利的存在，所以区分什么是所有权就变得十分棘手了。因为对一件商品的占有，很难说到底这个商品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就比如作者买了一辆自行车，那么，作者自己骑的话自然就是生活资料。但是如果作者把它借出去呢？或者我把它卖了呢？借出去当然也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并没有利润的产生。但是一旦作者把它卖出去了，这就不好办了。除非作者是把车子直接送人，否则总归还是有利润的产生的。这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中出现了差额。

但是，我们也都能明白，是不可能完全消灭掉这种买卖方式的。上世纪虽然严打投机倒把，但是又有什么意义和成果了吗？除了苦难又带来了什么了吗？对于所有权，当然不能采取马列主义那种脑瘫的区分方式。

---

<sup>10</sup> 这里用列宁的定义是为了更加简明的说明国家的本质。

<sup>11</sup> 节选自赵京《什么是所有权》（安那祺·自由社会主义，2015年12月18日）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本节中所说的“财产”全部是指生产资料，而不是所谓的生活必需品。

## 2.法律和警察

一切的暴君都声称他们给人民带来了幸福，不是吗？不管是二战中日本的天皇、纳粹德国的希特勒、苏联的斯大林，还是俄国的沙皇、美利坚的大总统，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反人民、不反人类的。而他们当中也没有一个人不声称自己是替人民着想的。但实际上呢？他们在一边声称自己是服务于人民的同时，又要尽可能的消灭掉所有反对自己的人。

国家不像是普通人想象的那样，仅仅只是一个地域上的问题，要阐述国家的存在，必须去说明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

既然国家是一种工具，一台机器，就必须有它的控制者。这个控制者在表面上好像是一个国家的元首、领导人。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国家的实质就是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时候，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合法化、秩序化，用这种压迫来缓和阶级矛盾。因此，国家是阶级的，国家的一切设施，一切的制度，都必然具有阶级的色彩。**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sup>12</sup>但是，要想保持这种压迫，就必须有自己的打手。也就是暴力机器。**法律、警察和军队是最常见的压迫工具。**

法律是什么？有的人可能会说：法律是惩治犯罪者的工具。这话对了一半。法律不仅仅是惩治罪犯的，法律还是镇压人民的。何以见得？举个例子吧。假如这个人抢了银行，他当然是个罪犯，他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并且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在大街上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就被定为罪犯，这说明什么呢？在很多情况下，某个人因为别人的批评而愤怒无比，这不是因为那个人说错了，恰恰是因为那个人说对了。先不提现代社会的事情吧，我们仅仅说以前的事情。在过去，只要有人胆敢发表反对国王，反对君主制，那么他就一定被定成十恶不赦的罪犯。但是这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呢？是叛国罪吗？还是因为他说话犯了罪？请别忘了，人类生来一张嘴，目的只有两件事，一是说话，二是吃饭。如果说这个人仅仅因为表达自己对当权者的不满就被安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这不仅是反自由的，更是反自然的。因为张嘴说话是人生来就有的权利。

不过，法律要想执行，就必须具有**强制力**，也正因为法律有着强制力，我们才可以说他是暴力机器。因为只要试图不遵守，甚至是反抗这种秩序，就必须要有谁来强行抓你了。这就是警察，作者也曾看过一个很经典的论断：“警察是抓人的，警察不是你妈！”

很明显，警察的存在就是为了扫清镇压一切反抗者，而不是什么所谓的“为人民服务”，从古至今，有一个衙门做到了为人民服务了吗？这些衙门只要不贪赃枉法，人民就已经很高兴了！至于什么毛左所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更是荒谬至极了，他们声称人民主动去砸碎暴力机器，打倒官僚、反革命和资本家，到头来呢？那个时候的基层，只要你表现出一点点他们认为“不正确”的态度，立刻便有人会打小报告，第二天就惨遭批斗。就连枕边人也不能相信。

回归原本的话题，抢劫银行也不一定就必定是犯罪。联系我们第一二章所说过的，资本家的钱只不过是巧取而来的。这些剥削、灭绝人民的刽子手，他们的私产绝不干净。但是，也并不能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就要赶尽杀绝，那样，革命者就反而成了刽子手了。对于这种人，将他们的财产**充公**便是。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充公，不是马列主义所说的充公。马列主义所说的充公，是指将所有的财产统统归于**公家**，而由公家来统一分配。而这样一来，就免不了**职业官僚**的产生，职业官僚产生了，自由便荡然无存。而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充公，则是直接归于公社，这个公社不是特指某个形式的组织，而是一个地区人民生活聚集的自然状态。且公社可**无限制拆分**。比如说有三个牧民都在这片草地上放牧，这片草场就是这三个牧民的公社。而有的人又要说了，无限的分裂会导致内部混乱……什么的。然而这种“混乱”，却也比被官僚所压迫好得多。因为一个公社一旦过大，就必然要产生权威，权威就是压迫的温床。因此，我们更倾向于委员会的管理。例如**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委员会，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

<sup>12</sup> 这是列宁的定义，此处只是为了更加容易说明而引用。当然，国家的压迫是盘根错节的，绝不仅仅只有一个阶级是压迫阶级，因此我们并不能幻想打倒一个阶级就完成了革命的任务。



我们会在稍后阐述。

让我们回到所谓的混乱之问题上吧！这种论调想说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人管人的制度**，也就是**压迫制度**。对于这个问题，长篇大论只会让人觉得厌烦。如果说人民的一切问题都必须由政府过问的话，那其实这种政府甚至比资产阶级的管的还要多。举个例子吧。农村的牧民们，当草场上的草料很丰富时，牧民们是供牲口随意吃的，但是一旦草料不充足，这些农户自然就明白要合理分配了。在物资充盈时按需分配，在物资不足时则公平分配。这是底层人民淳朴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显然不是政府所指导出来的。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人民的生活不需要有人指手画脚。农民们种地政府从不过问，也没有出现什么混乱，相反却能让人民更大的发挥出他们的智慧。

### 3.军队

军队则是另一种不同的暴力机器，前面我们说了法律，但是这个法律如果需要执行，就必须有警察来参与。而军队则是另一种执行机关了，军队是政府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是建立在对所有胆敢反对的人的血腥镇压上面的。我们可以在西班牙内战前夕的卡莎维哈斯惨案<sup>13</sup>里面看透这个问题的本质。

Cadiz 位于西班牙的西南海岸，面对大西洋，邻近摩洛哥，在内战爆发（1936 年 7 月 17 日）时属于叛乱地域。离 Cadiz 约 100 公里以北的内陆城市 Seville 在内战爆发时也属于叛乱地区。在 Cadiz 和 Seville 之间的山区有一个叫 Casas Viejas 卡莎维哈斯的小村庄，在这里发生了安那祺主义运动史上著名的“卡莎维哈斯屠杀”事件。

西班牙安那祺主义的根源来自于对天主教和王权的残酷支配历史的反抗。当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激励起民众的共和理想时，拿破仑的刺刀却架在西班牙民众的头上。这也是西班牙产生了最早的（在蒲鲁东等作出理论总结之前）伟大的安那祺主义艺术家 Goya y Lucientes（1746-1828）的原因。西班牙是安那祺主义发展成一种主要政治运动的惟一国家，而卡莎维哈斯被广泛认为是安那祺主义运动乡村起义的典型。自 20 世纪初安那祺主义哲学在欧洲传播并在其边缘地区（俄罗斯和西班牙）发展成长，那些刚刚形成的大都市中的“无产阶级”穷人阶层最容易受到安那祺主义的激励，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被初步组织起来的工会自然成为安那祺主义的主要力量。1933 年，刚成为共和体制的西班牙仍然处于专制势力（特别是军队）的威胁之下，另一方面，刚踏上政治舞台的都市劳工和村镇民众又不可忍耐地诉诸政治手段要求改善经济待遇。1 月 8 日巴塞罗那、马德里和 Valencia 等处的安那祺主义者在匆忙之中响应传闻中的铁道工人罢工而起义，认为可以一举摧毁旧制度，遭到政府的轻易击破。但在卡莎维哈斯，受安那祺主义影响的村民却于三天后袭击警察局，宣布实现自由共产主义。

此时，以 Azana 首相为首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并不能有效地控制社会，对于各地的来自专制势力和自由共和、安那祺主义的反叛，只能下令镇压，却随各地的警察和军队按其意愿执行。当卡莎维哈斯暴动的消息传到城里，一个中士奉命带着十二名警察先被派来赶到村边。三个小时以后，一个中尉奉命带着十二名士兵和四名警察前来增援镇压。此中尉头一天刚到任，对于本地怀着恐惧不安，本能地感到每一家村民都是叛乱分子。军队和警察们最终在一个烧炭的茅房处遇到武装抵抗，他向省长要求进一步支援，晚上十点时，省长的特使与两名带着手榴弹、来福枪和一挺机枪的下士也赶到了。天色已晚，中尉不想无谓地伤亡，准备第二天天明之后再进攻。此时，另一队载有四十名士兵的车队赶到，这支由一个上尉指挥的军队在出发前一天刚从马德里被调到一个叫 Jerez 的小城去镇压那里的安那祺主义抗议活动，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睡眠了，上尉曾拒绝来自内务部长的电话命

---

<sup>13</sup> 引自赵京：安那祺主义在西班牙的政治实践，卡莎维哈斯惨案。无修改。

令，但被迫带着士兵赶夜路到卡莎维哈斯去平息紧急状况。这些疲惫不堪的士兵原准备与成百上千的武装安那祺主义者战斗，现在看到面前的敌人只是躲藏在茅房里的男女老少，杀戒大开，不等天明，立即放火烧燃茅房，并射杀往外逃命的八个安那祺主义者。丧失理智的士兵们又报复整个村庄，射杀了另外十二个村民，酿造了震惊全西班牙的“卡莎维哈斯惨案”。

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从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警察一样，也从来不存在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军队的用途只有镇压，只不过这个镇压的区别是镇压本国人民还是镇压外国人民罢了。有的人要反驳了：不对！革命军队呢？革命军难道不是反抗压迫，寻求解放的吗？这的确是个问题，不过我们安那其主义者对于军队也有明确的态度：

“内战的军事化发展是起义的挫败。红军在一九二一年是赢了，但俄国革命却已然失败。……总之，面对军队，需要数量庞大的群众，进犯敌方的队伍，并与士兵亲善。我们需要一八七一年的三月十八日。军队上街，这就是揭竿而起的形式。军队开火，大局便已底定。每个人都发现自己被要求选边站，在无政府与对无政府的恐惧中做选择。起义是以政治力量获胜的。在政治上，战胜军队绝非不可能。”<sup>14</sup>

多么正确的结论啊！当革命军队变成职业军队的时候，这个军队的目标也仅仅只有两个了，那就是镇压国内人民和镇压国外人民。也正应了爱因斯坦博士的一句话：“当主权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时，战争就不可避免”。布尔什维克的确赢了俄国内战，但是却输了俄国革命。当新政府的旗帜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时，所有人都能明白，他们的主子又换人了。如果有谁胆敢反对这个新生的政府，新生的压迫机关，那么红军们可就看不下去了！苏维埃是民主国家，你可以选择被镇压的借口！

不过，虽然军队的枪口是直指人民的，但士兵也一样是受害者。各种规条戒律，各种压迫等级制度，是对于军队内部胆敢有说不断的士兵的绝对压迫。

下面，我们引用一段民国期间的安那其主义书籍来证明这个观点。仅节选，无修改。

“15……教弟兄们知道咱们所杀的，都是咱们的好弟兄，所服从的，都是害咱们的仇敌，所吃穿的都是好百姓拿血汗换来的，不是那大元帅、师长、督军他们亲自种地，织布养活着我们的。弟兄们，千万由根本上想一想，别把仇人当做恩人，再瞎给他们使唤愚弄着咧！……弟兄们：咱们入营当兵，爱的是国，还是为的吃穿呢？我想人人都为的是吃穿，没有一个肯爱国的。这是甚么说法呢？弟兄们你想，家是咱们人人都有的，若说到国，那一点儿地方是我们的，那一个地方是我们认识的。象那当官长的，他们可以就他们管辖的地方，向他们管辖的人民征收租税，克扣粮饷，还可以拿一国一省的名义，把大家靠着生活的各样产业，押实给外国人，得些个金钱，同着少爷们、姨太太们胡花乱糟。把国当做他们的摇钱树、护身符，把国内的人当做他们的家人奴婢、鸡犬牛马。非靠着这个国字，他们就不能卖大家的业产，夺大家的吃穿。所以他们张口也是爱国，闭口也是爱国。象我们当弟兄的，除非在自己家里吃饭不用花钱，此外任你到了甚么地方，见了甚么人，都是吃饭花饭钱，穿衣裳花衣裳钱，那里是我们的国家呢？我们不当兵，还可以有我们的家，若是一当兵，连家也没有了。……弟兄们，你看那火线上的人，那一个敢说保得住性命。年前我到过前线，在火线上看见好多挂彩的号哭，没有人向后方抬送；在路上看见好多横航竖卧的尸首，没人就地埋葬，浑身是血，臭气难闻，看看他们的肩章，都是我们当弟兄的。我起初尚说我们当军人的，若死在战场是很荣耀的、很光彩的。到看见他们有缺胳膊的，有缺腿的，有脑浆迸裂的，有肠子肚子都炸出来的，把官长平素种在我肚子里头的贪心勇气全都消灭了。不但消灭了，还觉着营里头的教训，没一样儿不是欺压我们的，巧使我们的。我们这身体是父母生下来养大的，受家中的恩惠很多，爱他是应当的。国是个甚么东西，于我们有甚么好处呢？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着，叫也叫不应。（弟兄们，不见那要饭的沿街叫唤么，那一个做官的把他请到衙门里去，给他一顿饭吃，那一个当财主

<sup>14</sup> 引自：隐形委员会《革命将至》

<sup>15</sup> 引自：李德胜述《兵士须知》

的把他请到家里去，给他一件衣裳穿。）无非几个奸雄想着欺压我们，巧使我们，又怕我们看他也是个人，也只有一个家，不信服他，遂凭空的造出一个国字来，把他抬的高高重重，说他有生杀人的权力，人有服从他的义务，非如此天下就不能够太平，人民就没人保护。甚么“法律”咧，“命令”咧，“忠顺”咧，“奖励”咧，“抵抗”咧，“违背”咧，“棍责”咧，“枪毙”咧，这些名目，全是他们私自造出来，教我们当弟兄的帮著他装在国字里头的。有了这个名目，他们可以管辖我们，杀我们，还可以教我们杀反对他们的。若没了这个名目，他们就不能发号发令，做官诈财。因此有说他们不对的人和说他们不对的书本出来，他们就怕的了不得，恨的了不得，硬说这是扰乱秩序，妨害治安，不是抄书，便是拿人。把反对他们的书叫做禁书，把反对他们的人叫做乱党、革命党、过激党，传知各路军警一体抄拿。我们当弟兄的不晓得反对他们的人和书本，都是替百把天下的善人善书，一网打尽，教一些坏东西横行霸道。请问问我们的良心，说得过去，说不过去。弟兄们，你想咱们一没有财产，二没有功名，三不大识字，那乱党也罢，禁书也罢，关我们甚么事。”

总的来说，军队的士兵一样是受害者，他们也是被压迫制度所摧残的生命，作为安那其主义者，我们不是刽子手，当然对于士兵也要采取友好的态度，不过这种友好，不是无原则的友好。

在政府面前，每个人都是喀琅斯塔德水兵，阿芙乐尔号的大炮是普通人打响的，革命军队也是人民组建的，但为什么这个军队的枪口要朝着人民？朝着我们自己的父老乡亲？革命绝对不是政府的替换。喀琅斯塔德的水兵向我们证明了，政府是从来也不会代表民意的。今天他们利用你挡枪子儿，明天你中的枪子儿就是他们的帮凶打出来的。

#### 4.只要有国家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

战争是人类社会的悲剧，战争的本质就是政治，但没有人会蠢到认为战争是享受。

早在克劳塞维茨所著的《战争论》中，就早已总结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对于安那其主义者来说，这又是个不得不仔细钻研的问题，下文我们利用苏芬战争的历史来讲述这个问题。

在中国古代的许多农民起义中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到这一点，每当起义或叛乱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必然有一种声音冒出来，说什么百姓渴望安宁，社会动荡不堪，必须要有人克承大统……之后国家便产生了，各层官吏也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以前允许的，新朝雅政未必允许。

但是，这不过是粉饰太平罢了。在“统一”的风岚中，人民依旧颠沛流离，被强征、被盘剥、被欺骗、被压制。毕竟话语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百姓不过是任人宰割的奴隶。

我们不妨来回想一下苏芬战争，就能很好的讲明这一问题，在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面前，斯大林的扩张版图行为，竟然可以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但就连希特勒也作出过很正确的评价：“斯大林热衷于扩张版图的原动力，来自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比来自于共产主义的要多得多。”

从沙皇俄国开始，一直到苏联的各个总书记的时代，俄罗斯民族的扩张行为从未有过收敛。斯大林相继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还与纳粹密谋，瓜分了波兰。但在这种情境之下，只有芬兰勉强逃过了这一浩劫。虽然在历史上芬兰从未形成过自己的独立国家，先后归属于瑞典和沙皇俄国。在1809年俄瑞战争之后，芬兰被并入沙俄，成为一个大公国。随着经济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传播，1899年芬兰建立了工人党，后来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并且于1905年领导了全国的政治性总罢工，迫使沙俄恢复了芬兰自治，取消了一切俄罗斯化的法令，甚至连妇女都获得了普遍的选举权。

1917年俄国革命期间，芬兰在12月6日宣布独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承认芬兰为一个主权国家，由此芬兰摆脱了长达一百多年的俄国统治。但芬兰独立后，由于俄国革命的影响，1918年1月到5月爆发了内战，但与其他沙俄统治的地区不同，芬兰红军没有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而是由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因此芬兰没有作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而并入苏联。

苏联支持的芬兰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一直十分恐惧芬兰的立场，因为芬兰距离苏联

的旧都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仅有 32 公里，一旦芬兰倒向纳粹，那么芬兰将成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因为这层关系，32 年苏联就和芬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34 年进一步将条约更正为十年有效。

而到了 1938 年，苏联则与芬兰进行了外交谈判，希望和芬兰联合，抵抗纳粹德国。并且希望芬兰能把列宁格勒外围领土割让给苏联，苏联则以北方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交换，形成列宁格勒的战略缓冲区。但谈判持续了一年以上却还是毫无进展，而此时欧洲的形势已经恶化，到了 39 年秋，苏联要求芬兰在列宁格勒附近后退二十五公里，而苏联愿意交换以两倍面积的领土作为交换条件。

可苏联割让给芬兰的领土却极度靠近北极，除了雪和北极熊之外没有其他的東西。战略价值远不及苏联所要的芬兰领土。这就好比拿县城的两套房换北京城区的一套房，傻子才做这笔买卖。而在 39 年，苏联已经强迫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三国准许苏联驻军。芬兰对于这种蚕食十分恐惧，于是用警戒的态度回应谈判，到了 10 月初，芬兰提出了一个让步较少的解决办法。

苏联想要的卡累利阿地区，靠近苏联一方的是森林和白雪，而芬兰一方的却是四条铁路，十条公路的重要战略地区，铁路直通芬兰西南部，起到运输枢纽的作用。另外，芬兰的主要工业也均分布于卡累利阿，比如木材工业、纸浆工业和造纸工业。另外，诺基亚是 1865 年诞生的，而诞生地也是卡累利阿（当时是纸浆工业）。为了拱卫这个战略要地，芬兰花费十年的时间修建了一条曼纳海姆防线（曼纳海姆是当时芬兰国防军总司令，还曾做过芬兰第六任总统）。

芬兰据理力争，严守原则的态度显然激怒了苏联。苏联对于这一小国根本不放在心上，甚至谈判也只是走个过场。

“跟你丫谈判是给你脸，你丫的还敢讨价还价？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几斤几两，你看到波罗的海三国了吗，老老实实听话保你平安。不就是当个傀儡国吗？咋活不是活着，有个大哥罩着多好。不听话，往西看波兰，尸体躺在地上，这就是例子，而且还是被分尸的”。

芬兰政府出于对本国安全的考虑，坚决拒绝对苏联作出任何让步，芬兰表示：“我就不，我就不我就不我就不，我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

谈判不成，苏联便制造了曼尼拉事件，性质和侵华借口九一八事变差不多，宣称芬兰军队炮击曼尼拉村，造成苏联士兵死亡，进而要求芬兰赔礼道歉，并要求芬兰军队后撤二十到二十五公里。被芬兰政府断然拒绝。紧接着，苏联撕毁了苏芬互不侵犯条约，准备开战。苏联的这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行径，和她的纳粹同志如出一格，实际上，德国入侵波兰也基本一致。

只从表面进攻不能有效的消灭对手，强大的堡垒往往都是在内部瓦解的，于是 39 年苏联扶植了傀儡政权，叫做芬兰民主共和国，希望借此煽动芬兰军队中的社会主义者哗变，但事实上这个傀儡政权造成的影响微不足道，只存在到了 40 年 3 月，后来便并入了苏联的卡累利阿加盟共和国当中了。

偷鸡不成只能明抢了。在战争前夕，苏联在苏芬边境集结了四个集团军三十多万人，18 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军，四个坦克旅，还有 800 余架飞机。

而反观芬兰方面，芬兰陆军只有不到三万人的队伍，陆军装备停留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水平，火炮均为 1900 年前后的轻炮，甚至有的连制退器都没有。坦克只有 28 辆，基本都是一战时期的法国雷诺坦克。但就是在相差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芬兰依旧打出了自己的气势，让苏联彻底吞并芬兰的妄想不得不面对现实。

按理说苏联是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理应热爱和平才对，而不应该搞这种像纳粹一样的侵略。但是就像巴枯宁所说的，当工人变成了政府当中的代表的时候，他就不再是工人了，他是个官僚。妄想官僚热爱和平和为民服务是不可能的，天下的衙门没有为老百姓服务的。

实际上也就是这个问题，当我们一次又一次见证了国家这个害人精的穷兵黩武和背信弃义，以及他对于人性的种种摧残，当然不能再幻想建立一个什么“人民的国家”，这是彻头彻尾的幻想，国家就是用来祸害人民的，而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就算他有时候的确给人民做了什么一丝半点的好处（相比起各层官老爷们可以说是一文不值了），但也不过是皇上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而已。

还是那句话，谁当大统领我不是在家炒土豆丝？

## 5.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也翻译作无产阶级独裁），是一种理想中的阶级社会，之所以说它是理想中的，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到现在为止从未真正实践过。只存在于少数人的理想当中。在这里我们无意侮辱任何一个学者，只表达安那其主义的思考。

1. 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这样的：在经历了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时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需要面临旧社会的反扑，包括旧贵族和大地主等等，这些大地主是不会甘心就这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在新社会刚刚开始，而旧社会还未完全变成历史，需要一段时间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等反革命势力的反扑，并且组织新社会的生产，以求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2. 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广大的无产阶级与农民实行苏维埃（代议制）民主制度，而对于资产阶级则重拳出击，采取专政态度。这个苏维埃在事实上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没有根本区别，都是由层层选举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由共产党领导，允许民主党派存在，采取民主集中制，拥有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但决定权在于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只有建议权。

3. 无产阶级专政采取三权合一的形式，避免了资产阶级国家分权制度的假象。

4. 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是公有制，从小规模的公有制一步步走向共有制，最终消灭所有制，消灭了所有制以后，便消灭了阶级赖以存在的条件，当阶级不复存在，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

5. 对广大的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破坏；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此基础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将随着自己的历史任务的完成而逐渐消亡。

我们首先要说的是，无产阶级采取什么方式来保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而工人是工农联盟的领导阶级，因为工人是**先进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个很经典的论述：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他们对于这个旧社会毫无留恋。故而他们善于毁灭掉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这个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十分清楚：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当中，只有无产者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共产党宣言》，38页

“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所有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同上，39页

“资产阶级首先生成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同上，40页

而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的陈独秀这样评价道：

“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陈独秀《我的基本态度》

<sup>16</sup>马克思的著述颇丰，不过关于“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统治形式（例如，与代议制的关系），他没有、也不可能展开充分的论述。我们所知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由列宁定义、发展并实践的。实际上，所谓列宁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

列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垄断性解释、定义，排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原本教义（社会民主主义），确立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基础的列宁主义。在已经初步掌握政权的基础上，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

---

<sup>16</sup> 节选自赵京《什么是所有权》，未作改动。

必然性认识，是出于俄国革命的现实考虑：“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列宁没有教条地把俄国的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执行体。相反，在《怎么办？》中，列宁指出，缺乏知识和经济能力的无产阶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所谓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那是安那其主义、工团主义的“胡说”），只有在某些教主（马克思）教导下，在某些职业革命家（列宁本人）的领导下，依靠一个铁一般纪律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强制地灌输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理论，才能领导工人阶级、依靠农民阶级、利用知识分子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从“被扫进历史垃圾堆”（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大会上对多位退席抗议的社会革命家的宣判）的各俄国政治力量的各种回顾纪录看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基础在于沙皇崩溃下那些刚从农民转换为士兵、水手和工人的政治活动分子接受了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鼓动。俄国革命政治上的成功带来的列宁主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列宁的天才，是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来源于经济发展规律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没有本质上的逻辑联系。就政治发展方向不以经济发达程度为转移的事实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并不确立。

实际上，我认为所谓“列宁主义”的形成是在布尔什维克刚用武装手段占领冬宫等象征性部门驱散临时政府成员不久的十一月十七日，在“起义”大本营斯莫尔尼大楼讨论是否停止前几天刚颁布的“暂停新闻自由条令”。此时，仅仅在军事上控制彼得堡的“人民委员会”除了布尔什维克，只有左翼社会革命党。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反对列宁的人数也不少。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成员 Larin 提议解除“政治恐怖”，恢复新闻自由，得到左翼社会革命党和部分布尔什维克成员的热烈赞成，而“列宁派” Avanessov 提议推迟讨论新闻自由，却遭到强烈否决。此时，列宁“力挽狂澜”，力陈剥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权力，以 34 对 24 票通过了列宁的提议。具此，左翼社会革命党宣布退出军事革命委员会（彼得堡的实际军事指挥机关）和辞去“人民委员”的五个职位。连许多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包括核心人物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也反对列宁的提议，退出中央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这实际上不仅是布尔什维克一党专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开端，也是列宁个人独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形成的起源。需要指出的只是：在当时的特殊条件下，列宁的政治天才本能地预知，只有这样的个人领袖独裁下领导的一党专制，才能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动员广大的工人、士兵继续把被扭曲的革命推动下去。

关于一党制与多党制，第四国际已经明确地决议到：“工人阶级行使政治权力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享有组织不同的政治团体、政治派别或政党的自由。”“限制组织团体、派别、政党的自由，并不是限制阶级敌人的政治权利，而是限制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除非群众有组织政治团体、政治派别及政党的自由，否则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中，从来没

有一个观念认为一党制是工人政权、工人国家或无产阶级专政的必需先决条件。”到此，我们可以下结论到：无产阶级专政才是原初的“权宜之计”。我们不得不回到了陈独秀的结论：“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东西，它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织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便是革命家代替工人阶级革命，因而不可能是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工人阶级只有应用民主手段来争取政权，才能建立民主的工人政府。”革命党应用暴力和阴谋手段来推翻旧政权，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不可能是民主的。“这些说法……，不管我们是否同意，却必须承认它们比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是更彻底与一贯的。陈独秀如果要把他的绝对民主论贯彻到底，就得接受这些个说法。”陈独秀之所以没有走到这种“说法”，并不是因为他缺乏严密的逻辑思维训练，而是因为中国的历史现实没有提供这样的条件。苏联和中国的现实表明：没有劳动阶级的自我解放，即使由列宁、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天才领导的政治胜利也无法保证形式上的社会主义成果。第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把第三国际（列宁主义）的失败只归结于斯大林主义而对列宁主义的“权宜之计”性格视而不见，最终没法回避第二国际的遗留问题。而解决第二国际的民主与专政之争，又得回到第一国际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的分裂教训上。<sup>17</sup>

对人民劳动的任何剥削，无论用什么样的虚假的人民当家和虚假的人民自由的政治形式给它镀上黄金色彩，对人民来说都是痛苦的。这就是说，任何人，不管天性多么温顺，不管具有多么听从于当局的习惯，也不会甘心情愿地服从；要让人们服从，就必须有经常性的强制和暴力，也就是必须有警察监视和军事力量。

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它尽管具有一切民主的形式，但将是实实在在的专政。

“请问，如果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例如，大家知道，贱农是不受马克思主义者赏识的，而且文化水平最低，他们大概要受城市工厂无产阶级治理。又如从民族观点看待这个问题，那就可以假定，对于德国人来说，斯拉夫人将由于同样的原因对胜利的德国无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像德国无产阶级对本国资产阶级处于奴隶般的从属地位一样。”

在马列主义的论述中，对于农民的言论从不是友好的。好似他们只不过是愚蠢的屁民，他们的作用只在于被剥削一样。我们当然可以复述他们的论调：

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有许多优点和长处，如勤劳、善良、质朴、憨厚等等优良品质。但从本质上看，由于农民群众分散的落后的经济地位，从根本上决定了他们思想上不可克服的缺陷。作为小生产者，狭隘的、闭塞的自然经济使农民目光短浅，自由散漫，心胸比较狭窄，家族观念和地方观念较强，这就不容易形成长久坚强的内部团结；作为小私有者，农民阶级私有观念比较强，这正是历史上农民领袖往往争权夺利贪图享乐的思想根源；此外，再加上各种腐朽的封建思想对农民阶级的侵蚀影响，农民队伍中不健康的观念和习惯存在是比较普遍的。总之，可以把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包括为：封闭保守而缺乏创新意识；自给自足而缺乏合作精神；与世无争而缺乏竞争意识；安于现状而缺乏民主意识；重视体验而缺乏理论指导；追求平均而缺乏进取精神等。

这种论调简直是在公然的将压迫和剥削正当化。

“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整个无产阶级都成为行政首脑吗？德国约有四千万人，难道四千万人都将成为政府成员吗？全体人民都成为治理者，被治理者也就没有了。那时就没有政府，没有国家。如果有国家，就会有治理者，就会有奴隶。”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最可悲的结果：少数特权者统治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他们一

---

<sup>17</sup> 引用到此为止。

且变成了人民的统治者或人民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待一切普通工人，他们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统治人民的欲望。谁怀疑这一点，谁就是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

但是，这些当选者会是具有坚定信仰的、而且是博学的社会主义者。在拉塞尔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演讲中经常使用的“博学社会主义者”、“科学社会主义者”这些名词本身就证明，所谓的人民国家不是别的，而是由真正的或冒牌的学者所组成的一个人数很少的新贵族阶级非常专制地治理人民群众。人民是没有学问的，这就是说，他们完全可以从繁忙的政务中解放出来，完全被归入治于人的畜群。好一个解放！

现代的国家，就其实质和目的来说，必然是军事的国家，而军事的国家也就必然会成为侵略性的国家。如果它自己不侵略，它就必然被侵略，原因很简单：哪里有武力，哪里就必然要炫耀或者运用这种武力。由此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现代的国家必然要成为强大有力的国家，这是保存自己的必要条件。

## 6. 追寻“修正主义”之本质

恩格斯去世之前，曾指定伯恩斯坦作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之一。可恩格斯永远不会想到，伯恩斯坦在他去世第二年，就开始有系统的修正主义。从1896年开始，伯恩斯坦首先在《新时代》上连续发表多篇有关修改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三年后，他完成自己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任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

但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晚年很少再有关于武装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论述了。第二国际也更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在列宁垄断马克思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别称而已。伯恩斯坦被称为修正主义者。他本人对此也是直言不讳：人们读到我时，不是把我当作一般的修正主义者，而是当作大修正主义者。而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徒考茨基，也十分明智的避免与国家政权作正面冲突。

在列宁的时代，修正主义仅仅只单指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社会民主主义，到了毛泽东时代之后，为了防止政府的腐化堕落（我就权且这么说吧，不过，政府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压迫人民，区别仅仅是在于压迫的方式而已），发动了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等等所谓的“阶级斗争”行为，但却收效甚微。

首先要搞明白的是，修正主义到底是个例，还是必然。从各国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来看，似乎答案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走向修正主义，否则就只能破产倒台。修正主义似乎一瞬间就在苏联成型了，随着赫鲁晓夫的上台，苏联走向了修正主义。但贯彻了斯大林钢铁精神的苏联，几十年来经历了大肃反和二战，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概念理应站住了脚，又怎么能发生赫鲁晓夫改革十分顺利的问题呢？假如只有赫鲁晓夫一个人是修正分子，那么为什么没有其他官员给他斗下去呢？我们再退一步，就算苏共中央全都是修正分子，那人民群众呢？为什么没有阶级斗争打倒修正主义呢？是因为政府和军队吗？哦，抱歉，我不应该说的这么直白，这些压迫组织在没有修正的真正社会主义者手里就已经成型了。至于祸害人民、镇压人民这事，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学。

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我当然不是否定阶级斗争理念。但是这个阶级斗争到底是怎么进行的。革命是一个阶级打倒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阶级斗争应该怎么实践呢？打倒一个再修一个，修一个就再打倒一个？有人又要举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出来了，说什么革命总是要经过波波折折最后成功的。但是，波旁王朝的复辟，是旧王朝的复辟而不是旧制度的复辟，难道不是这样吗？在上一节我们论述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也正好说明从来就没有什么修正与否，有的只是统治方式的差别罢了。

当然，我们还可以再说让毛派们十分骄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吧。它被称为是一场伟



大的夺权运动，夺走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分子的权力，把真正的权力还给人民。

哈！我首先要问的是，人民什么时候掌握了政权了？政权难道不是镇压人民的暴力机器吗？还是说七亿中国人全部都是统治者？他们要统治谁呢？谁又是被统治者呢？是那群资产阶级吗？难道这些人要妄想一小撮资产阶级养活一大帮无产阶级吗？

醒醒吧！从来也没有过什么人民的政府。文革也不过是高层之间的夺权活动，受苦的就只有人民群众了。作为人民群众，他们懂什么社会主义建设？列宁在《怎么办？》里面不是已经说过了无产阶级是没有办法自我解放的吗？为什么列宁的徒子徒孙们又开始鼓吹起来无产阶级自我解放了？睁开眼一看，原来毛主席高高在上，坐收渔利，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政权的打倒和解放！

底层的人民群众当然不知道什么是阶级斗争，只不过上面来了红卫兵，全国都动起来了，得迎合一些掌权的这些红卫兵罢了。红卫兵看谁不顺眼就抄谁的家，今天井冈山革命派打倒 xx 公社革命造反派，明天 xx 公社革命造反派就来革井冈山革命派的命。在这种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完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难道就是吃糠咽菜吗？社会主义的存在不是为了吃草也要过“社会主义”，大鱼大肉也不过“资本主义”的。如果在革命后的“新社会”里面天天需要担惊受怕，谨言慎行，小心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就要被批斗，那这个新社会难道不是比旧社会还要黑暗与无耻吗？

换一个层面来看，这种自相矛盾的理论主张，正好让右派分子坐收渔利。回想纳粹上台的那段时间，希特勒都骑在人民头上拉屎了，台尔曼（他被某些人称为人民的选择）还在议会和社会民主党打的不可开交，斗修反修。不过我认为他也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了，因为就在纳粹上台的前夕，他终于把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给斗出去了。

也正是这种内部混乱、自相矛盾，让资本主义的学者们开怀大笑，说出了各种理论来欺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让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苏联那个样子，最终失望绝望，而选择在资本主义中送葬自己宝贵的一生。

人民需要的是自由和面包，不是官老爷们的政治理想，从来不存在什么修正主义，有的只是因为统治方式改变，但政权没有变化的自我欺骗。任何一个底层的民众都能明白这个简单的问题，却有很多人不愿意正视。

## 7. 国家不可能自行消亡

为了让读者您明白马列主义的“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我必须完整的引用恩格斯的原文，以便我能够向您挖出其中的谬误，您也能看得明白。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

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sup>18</sup>  
(还请读者暂时记住我加黑的几句话)

好吧，来开始我们本节的主题吧。首先，国家是压迫人民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我们在前面也引用了巴枯宁先生的见解，证明了不存在什么“人民的国家”，因此，**国家的存在只能是反人民的**。那么，让一个反人民的机器掌握了所有的生产资料，这将带来什么后果呢？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说过了垄断灾难性的后果，而让一个更大的垄断体掌握了一切，后果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上世纪苏俄的饥荒也证明了这一点。

好吧，就算所谓“人民的国家”（一般是指无产阶级专政）是存在的。那么这个机器要让谁来掌握呢？不还是要让官僚来掌握吗？职业官僚只在乎自己能捞多少钱，不在乎泥腿子吃饱吃不饱。各国共产党的叛变堕落早就证明了这一点。

好吧！我们再退一步，就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施行的很顺利，也没有出现官僚主义的问题。那么，当国家真的把所有的生产资料归于公有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到底要不要往更高层面的公有转化呢？这个问题是十分深刻的。我们还是得举例子。毛泽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为什么和斯大林苏联的关系一直很冷淡呢？为什么已经共同都建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还是要相互防备呢？难道无产阶级不是已经掌握了国家，让一切的资产阶级的宣传都滚蛋了吗？难道无产阶级不是热爱和平，这个两个国家不应该团结一致吗？

但这就是国家利益的冲突，就算不愿意承认，事实就在那。如果两个国家有一个选择让步，那必然是要出让自己国家的主权。就算公有制到达了最后的形态，即国有制，那之后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把外国并进来？成立两个或者多个国家的共和国？好吧，我就一退到底了，就算这样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了，那么又要怎么管理呢？就连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共生的国家，都会为了鸡毛蒜皮的破事大打出手。那么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用什么够确保不出现内乱？有什么理由保证不会出现因分配不公而产生的暴动？而且本来各地的差异就十分微妙，古人也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现成的例子，想想奥匈帝国吧，她有多悲惨呢？

醒醒吧！别做这种黄粱美梦了！国家是根本不可能自行消亡的，国家生下来就是为了欺压民众，就是为了维护剥削。区别只是在于对于剥削要怎么美化，怎么粉饰而已。

## 8. 入主中原、天下大同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不存在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的国家了，因此作者有必要讲清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夺权。如果非要用文字来讲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话，那就是“削权”和“篡权”的区别。削权是指废除权力，而篡权是指把统治阶级手里的权力夺到自己手里。因此作者认为，马列主义先锋队指导下的内战是夺权战争，而不是革命战争。这种战争并没有直接废除压迫的权力，而是用一种新的压迫取而代之。不过，也会有人用马克思的话来反驳说：为什么就不能让被压迫者拥有国家来反抗曾经的压迫者？安那其主义是剥夺革命者反抗压迫的权利！我们就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社会主义是为了抹杀人管人的制度，最终为了达到全人类的解放，这是所有人公认的。那么，如果这些代表当上了官僚，就不可能再为人民服务，而只能为国家服务（也就是为压迫服务），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也就无从达成了。

好吧，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比较民主的派系不是吗？

我要提出，如果真的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架构整成类似资产阶级三权分立那样的话，不也就是间接承认了这些人是压迫者，而不是革命者、解放者了吗？这种行为不就是公然的承认社会主义也是人管人的压迫体系吗？

退一步吧，就算真的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弄得民主化了，弄得十分松散，处处限制、处处掣

---

<sup>18</sup> 恩格斯：《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肘。那么这还是列宁主义吗？这不是拐回了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去了吗？不是拐回社民主义了吗？

让我们再换个视角吧：

你们说这是革命者为了反抗暴君的暂时的行动，但这个暂时是多久呢？什么时候压迫者算是没有了呢？这个标准是谁来制定的呢？是人民？还是官僚？好像还是官僚来决定的吧。但是，这不是又拐回我们上面所说的第一点了吗？就算不愿意承认，但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谁是无产阶级，还得政府说了算。

再进一步，这个政府，这个国家，声称解放工人阶级，但却基本否认工人阶级的自主权，一切都要听党的，甚至连工会这种基层的自治组织都要畏惧。他们到底在畏惧什么呢？这不是解放吗？连本阶级的民主都不愿意给予的政府，这比资产阶级政府还要专制，也更谈不上什么革命，什么解放。也正好回到了我们本节的要点，所谓“无产阶级先锋队”所“指导”的革命，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究其根本，它和古代的农民起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也正应了赵京先生的那句话：到底是一群什么人，是为了夺取政权才参加这个革命的？

马列主义总是培养幼稚病：我学了牛逼的最革命、最“科学的”理论，就掌控了“主体性”，而没有掌握的人就是“浅薄的”、“愚昧的”和“无知的”——就好比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对待异端的态度一样。怪不得他们领导人的后代总是先天愚型。

其实最主要的是，革命是一种状态，一种持续性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手段，要想革命，就必须发动人民大众。但人民大众一旦醒了，就不会再睡着。官僚们明白这一点，所以说革命是手段，防止这些泥腿子到时候把自己的脑袋开瓢了。

“头儿们总是害怕手下的人有枪杆子，就算有的时候有必要这样，他们也一百个不情愿。”

## 第四章：安那其主义之基本思路<sup>19</sup>

共和国、宪法，  
多么动听的名字！  
可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看啊，饥肠辘辘的穷苦人，  
依然衣不蔽身，  
依然劳累困顿。  
再来一次革命啊！  
这次应当更向前一步，  
应当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如果说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正当孪生宠儿的话，无政府主义最多只能算是社会主义的私生子，与两位嫡生幸运儿同源却不同宗。无论是痛恨沙皇的宪兵、专制开明的君主，以及共和国的警察，还是哀叹侧翼的排挤、暗算，无政府主义的命运，正如领导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对孟什维克派的攻击一样：“非常遗憾，诸位已经被历史遗忘，你们的命运可悲，你们的作用已经完成，你们将被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那么，当我们看到：托洛茨基被自身创建的共产主义政府流放到国外，七十年前孟什维克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重新在俄国取代共产主义极权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期待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复兴呢？

我首先要说的是，安那其的理论体系当中并不存在错误与否的概念<sup>20</sup>，我们并不对某个人物及其他的理论顶礼膜拜。既然安那其是自由的代言人，自然每个人对于社会的构想都是不同的。也有这种说法：一万个安那其主义者中有一万种理论。但归根结底，没必要为了路线打得你死我活，不过，这是对于安那其主义者内部来说。

作为社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却是十九世纪的产业革命冲击和法国大革命神话破灭的产物，目睹了当世的政治革命、宪法改革的失败，产生了对旧有的所有革命方法和目标的攻击理由和机会。无政府主义者所反对的，就是从十九世纪至今的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越来越高度的中央集权、越来越发达的产业国家。这样，无政府主义的宿命就是不断反抗所有热衷于权力追逐的社会集团：从地主阶级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政府主义就是旧有的宗教信条与新兴的合理哲学冲突的产物，其最大的理论代表就是“启蒙主义的私生子”蒲鲁东。

为了给最贫困、最大多数的阶级找到改善其物质、精神、道德状态的方法，而且是从根本上一举解决问题，蒲鲁东本能地反感近代社会越来越占支配地位的产业发展，这就是他与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同之处，认为他们所设计的“新社会组织化”不过是既成要素的再排列，把权力从一个组织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完全没有意义，特别不能相信那些财产共同所有、由中央政府强制管理劳动的共同体乌托邦。作为人的第一要素的劳动，只能由各自的劳动合作来自治管理，在排除政府干涉这一点上，蒲鲁东承认亚当·斯密是他的老师。

但无政府主义的这位最大代表在理论上的漏洞立即被当时还不太有名的德国犹太人马克思的严密、独断的黑格尔哲学思辨所驳难。当时代的发展需要一个无政府主义的运动领袖的时候，从俄国逃出来的巴枯宁就应运而生了，无政府主义运动与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合流在伦敦成立的第一国际上。

<sup>19</sup> 本节所讲述的两个安那其主义的派系只不过是边边角角，安那其的派系很多，作者并不能一一讲解，但本质都是对自由的追求。

<sup>20</sup> 不过，这里面当然不包括安那其资本主义。

## 1.性别与种族之平等

农民、渔民、都市的小商业、小手工业者，还有其他各个阶层的人民，都是受到国家制度所压迫的群体，他们受到了和工人阶级一样的待遇，被压迫、被盘剥、被欺骗、被背叛，甚至于被忘记。特别是到了现在，在新自由主义下，社会的教育、医疗等福利都越发难以推行下去。在家族、地区间的分断也已经基本解体的现在，除了一小撮统治者之外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渐渐无法生存下去了，他们处于勉强果腹的状态。而统治者（我是说所有的统治者）根本没有任何办法解决这个棘手的局面，想要活下去的怒火燃烧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不需要煽动和欺骗，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懂得这么浅显的道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革命来毁灭阶级社会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民族压迫、种族歧视、残障者歧视、女性歧视、跨性别者、同性恋群体……，越来越多的受压迫群体都是阶级社会的一个又一个衍生物，而资本主义社会，仅仅只是把这些矛盾变得更加尖锐、更加棘手罢了。在被种种枷锁勒住脖子，渐渐地窒息的社会中，这些群体从压迫与歧视当中站起来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颠覆阶级社会，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任何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被压迫的人民，都要联合自己身边的同志们，跨越自身的阶层与阶级，共同的站起来，通过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来实现自己的解放。而对于这个革命来说，任何一个被压迫的群体的加入，都是极好的。所有的人高举着自由的火炬，形成一个巨大的同盟，在这样强大的团结面前，一切的军事力量都是渺小的。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团结，我们最终可以达到全人类的解放。

究其根本，性别与种族本身就是毫无差别的。在性别的歧视与压迫上，LGBTQ 群体一次又一次的取得了胜利。同性婚姻已经受到了法律的认可，也越来越受到社会本身的接纳。作为社会的一个独立的成员，性别本身并不重要。爱就是爱，谁也无权干涉。

而种族歧视，甚至在遥远的 18 世纪，黑人们就已经发起了追求解放的暴动，虽然最终由于实力的悬殊而失败，但一次又一次的行动，证明了种族本身就是平等的。从来没有生来的低人一等，难道有哪个贵族，生来就比任何人都高贵吗？他能够通过自身的性别，让自己的生命比谁长一个星期吗？或者说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肤色，让自己吃穿能够不劳而获吗？

任何一个劳动者的光彩，都比这种歧视者美丽十倍。

## 2.不存在什么所谓“先进阶级”

但凡是一个马克思社会主义者，都一定听说过“工人阶级是唯一革命的阶级”这个论断，并且有很多人将其奉为圣经。更有甚者则将列宁主义者的“无产阶级专政”标榜上了风云神坛。但其实将社会中的阶级划分为革命的与不革命的过于草率，也不能体现马克思哲学中的辩证思考。工人与农民，理应是更加亲密的关系，而不仅仅是在当局的鼓吹下才有存在意义的“工农联盟”。可能有的人会举出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例子，然后说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变质了。但他们却根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农民起义的背景、条件。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下，农民自知本身就是被剥削的存在，并且不知道应该如何去打破这恶性循环，这个农民如果不是剥削者，就一定是被剥削者。因此农民们会拼命地想做“人上人”。这是时代不可避免的悲剧。

实际上，农民远没有马列主义所说的那么“愚蠢”和“落后”。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更加淳朴，更加单纯。我们想想吧！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暴君刽子手们，到底是怎么对待农民的？他们美其名曰为“合作社”，但本质上是什么？农民得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了吗？土地依旧是在老爷们手里。农民依旧被绑在土地上动弹不得，他们的劳动依旧不是属于自己的，一切都要被官僚们支配。这些老爷们还对农民们夸夸其谈，许诺等到战争结束后如何如何，空头支票的白纸满天飞，实质上却毫无动作。对付这种行为，农民们当然知道哪边是炕头热，他们明白这些刽子手不是来解放自己的，这些刽子手和沙皇的帮凶没有区别。故此他们才会对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流露出敌对的态度。农民们绝对不是

什么“落后阶级”，他们明白谁对他们好。如果布尔什维克换一个方式，可能收效就会好得多。

当然也有其他的声音，说什么人民是愚昧的，需要“领袖”领导……云云。结果，就是这些“领袖”，如果人民不养活他们，他们也躲不过饿死的悲惨命运。说来可笑，亚当夏娃们辛勤劳作，绅士贵族却现身何处？这些领袖对于压迫自己的反对者和人民可是不择手段。不论是纳粹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智利的皮诺切特或者苏联的斯大林。他们都自称是人民的拯救者。但如果他们没能做到身居高位，坐在王座上依靠国家来压迫人民，难道真的能够靠着劳动养活自己吗？

但在乌克兰农民追求自己的自由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老爷们是怎么对待他们的呢？在布列斯特条约里，乌克兰被割让给了德国刽子手。这时候，那些布尔什维克的红军怎么就不革命了呢？这些人的信徒可能要说，他们必须结束战争，否则红色政权就要不保了！真是现实呵！原来你们也怕自己再次下野！你们也怕自己失去了统治权！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难道不是人的全方面解放吗，难道吃糠咽菜就是社会主义？通过布雷斯特条约，俄国的农业损失了 33%！社会主义的存在不是为了吃草也要过“社会主义”，大鱼大肉也不过“资本主义”的。其次，割让了大部分的农地，粮食从哪来？革命要怎么进行？那就只有通过极度压榨俄国农民了。1918 年 2 月签订了布列斯特合约，1918 年 6 月就颁布了战时共产主义。农民们没有在战争中死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却饿死于“革命”的征粮队。巨大的饥荒饿死了极多的人民，具体数字颇受争议，此处便不写了。饥荒直接导致了革命的中坚力量喀琅斯塔德水兵们的叛乱，他们打着：“要苏维埃不要布尔什维克”。

实际上，布雷斯特合约的签订同样不符合苏维埃的原则，从 1917 年 12 月初开始谈判时，面对德国极其苛刻的条件（将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局部和拉脱维亚、白俄罗斯的全部割让给德国并赔款 30 亿卢布），苏共中央在 1918 年 1 月 2 日、1918 年 1 月 24 日的会议上都否定了列宁的同意主张。甚至在 1918 年 2 月 18 日面对德国最后通牒的紧急会议上，最高委员会依旧以 6 票同意 7 票反对的结果被驳回。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只能威胁道如果这种空谈继续下去，他就要辞职，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布哈林对此毫不在乎，斯大林也未发生动摇。托洛茨基不同意列宁的意见，但为了防止列宁辞职和党的分裂，他的态度发生变化。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 4 票弃权。结果列宁的主张以 7 票赞成、4 票弃权、4 票反对获得通过。同日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再以 116: 85（26 票弃权）之多数通过。

### 3. 下放权力<sup>21</sup>

对任何革命而言，重点是要使自身不可逆转。不可逆性的实现，是在我们同时战胜权威以及对权威的需求、同时战胜财产以及对占有的体验、同时战胜霸权以及对霸权的渴望。这就是为什么在革命的过程自身中便包含了其胜利的形式，或是其失败的形式。**破坏从来就不足以让事物具有不可逆性。**重要的是做的方式。有些破坏的方法绝对会刺激它所压碎之物的回归。**猛烈追赶某一秩序之尸首的人可以肯定，这绝对会挑起复仇的志业。**因此，在任何经济被阻滞、警察失去作用的地方，重要的便是在推翻权力时，煽情越少越好。权威必须由审慎的从容与嘲讽来废除。

确切地说，早在与警力对峙前，所有社会运动遇到的第一个障碍，来自于两股势力：工会、和其他所有坐在小办公室里打着领带、职业是领导和管理抗争的人。公社、底层团队和组织会本能地防备他们。这也是为何二十多年来，这些官僚主义反对者创造出一些因为不带标签而看似较为天真的协调委员会，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他们的演练场所。当一个迷途的群体试图获得自治时，他们只会透过坚定地排除真正的问题来停止清空自己。他们发狂，脑子发热：不是为了对辩论的热情，而是为了某种对辩论的回避——出于其职业需要。而当他们那被冷漠所揭起的辩护总算在总体上有道理时，他们却以政治意识的缺乏来解释其失败。必须这么说：在法国，青年革命拥护者并不欠缺政治操弄的艺术，这显然应归功于托派信徒各个不同分支的狂热活动。但他们显然在二〇〇五年的动乱

---

<sup>21</sup> 本节选自《革命将至》无删改

中记取如下的教训：只要有协调存在，就不需要协调；在已经自我组织的地方，组织就多余了。

另一个反射动作是，连在最小规模的反抗运动中，也开代表大会并进行投票。这是一个错误。一个简单的投票和决定赢家的作法，都足以将大会变成一场恶梦，变成权力竞逐对抗的舞台。在此我们承受的是资产阶级国会式的错误范例。会议并非为了取得决定而设置，而是为了得以彼此阔谈，令言论无目的地自由展现。

在人类的习性中，彼此聚集的需求，大概和决策的必要性之罕见一样真切。彼此聚合回应了感受某种集体力量的快乐。决定只在某些紧急情况下是重要的，而在这些情况下实行民主无论如何都只是一种折衷的方式。在其他情况下，「决策过程的民主性」就只是狂热的程序主义者的问题。这不在于批判大会或是废除大会，而是在于解放其言论、姿态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只需要看到每个来参加大会的人不只是带着他们的观点和提案到场，还带着他们的欲望、连结、能力、力量、悲伤，以及对他人的某种敞开，就可以明白。如果我们能够撕碎这种对代表大会的幻想、代之以一种出席性集会，如果我们能击退权威不断重生的诱惑，如果我们能停止将决策当作终点，就有机会在我们之间产生某种大众结合——某种集体结晶的现象——此时决策便能掌握个体，不论是其整体或仅是部分。

这对于行动的决策而言也是同样道理。因为若从「行动应当指导集会议程」的原则出发，将让激烈的辩论和有效的行动变得不可能。一个由彼此陌生的人聚集而成的大型集会，必然会要求专业的行动，亦即，为了控制的需要而放弃行动。一方面，代表们依定义会阻碍他们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没有什么能妨碍他们欺骗任何人。

以形式而言并不存在理想的行动。重要的是行动会塑造形式，它会让形式浮现，而非强加一个形式在行动上。这代表了站在相同的政治和地缘立场——像是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公社地区——以及共享知识的流通。对于行动的决策而言，原则如下：每个人都自行出发侦查：讯息被统整后，决策会自己来到我们身边，而非我们做出决策。知识的流通会消除阶级差异，从高处获致平等。让横向沟通不断增加，这是不同公社之间的最佳协调形式，以终结权威。

这个时代，革命中心的终结，回应着权力的去中心化。冬宫还是存在，但比起反抗者，它更是设计给游客攻击的对象。今天，我们可以占领巴黎、罗马，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不需要向谁回报这个决定。占领杭吉斯集散市场会比占领爱丽舍宫更有效。权力不再以世界的某一点为中心聚集，权力就是这个世界本身，这世界的潮流和街道、它的人和规矩、它的密码与技术。无权力就是大都会的组织本身。它在自己的每个点上，都是这个商品世界完美的整体。同时，任何人在地方层级打败它，都会产生出一股穿越整个星球网络的震动波。克力奇苏柏的暴动让不只一个美国家庭欢欣鼓舞，瓦哈卡州的反抗者在巴黎市中心也找得到同志。对法国而言，中心化权力的失落，意味着巴黎作为革命中心的结束。一九九五年的罢工之后，所有的新运动都在肯定这一点。最无畏、最坚定的行动，已不再发生在巴黎。一言以蔽之，单纯作为一个暴动攻击的目标上，如同一片纯然为了遭到掠夺和攻击的土地般，巴黎展现着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入侵来自于他方，短促而猛烈地攻击大都会支流网络中最稠密之处。是这些散播着的狂怒在这个荒漠虚假的丰沛上划下刻痕，而后消失。这样的一天将会到来，首都可怖的权力凝结体将被完全毁弃，那将会是某个过程的终结，而这个过程将在各处以更进步的方式进行。

## 4.委员会

有人也把公社叫做小政府，把推崇公社（委员会）进行民主管理的主义叫做小政府主义。这个说法对不对请读者自行判断。作者认为，小政府主义应该划入无政府主义的范畴当中去。因为这种小政府主义和普通的政府有很大差别，最深刻的一个就是小政府主义的委员会没有强制力。

强制力就是强制施行某一政策或者决定的暴力机器。比如政府要在你家门口挖个粪坑，你不愿

意也没办法，要么乖乖的把路让开，要不就进监狱喝茶。你不听话，我就干你。就是这么简单。

而委员会，也就是小政府主义并没有强制力，他们所做的各种决策并不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委员会决定了要在你家附近盖什么，你不准许，他们也是无计可施。固然集体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这个集体的利益和个人的利益起了冲突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无视个人的利益。否则这就不叫民主了，这是多数人的暴政。当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

请允许作者举一个例子：

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一世的隔壁住了个农夫，他的房子让皇帝陛下十分烦心。于是皇帝陛下威逼利诱，首先用钱准备收买这个农夫的房子，农夫不愿意。后来，皇帝用自己的威势吓唬农夫，农夫也不吃这一套。最后，皇帝暴跳如雷，叫自己的军队过去把农夫的房子给平了。结果农夫还是不服，告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按照法律，要求皇帝把农夫的园子恢复原样，并且赔偿。皇帝就算位高权重，也只能照做。

即便世间的道德要求我们乐善好施，但是也并没有任何强制的法律要求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午饭分给穷苦的人。就算这个人的恶劣行为受到了道德的强烈谴责，他也依旧受到个人权利与法律的保护。

读者，您明白两者间的区别了吗？

## 5.救命呀！<sup>22</sup>

现在是甚么世界？是人吃人的世界——强的吃弱的，富的吃贫的，凶狡的吃忠厚的，没良心的吃有良心的，血肉模糊，禽兽界断没有这样悲凄惨淡的景象。

为甚么闹到这样呢？有国家，有政府，有官，有绅，有兵，一辈都是强者、那弱的就要任他吃了。有私产，有金钱，有三几万家当的叫做小资本家，有三几十万的中资本家，千数百万的叫大资本家，土地任他要，机器由他霸，衣食住的东西听他独占、那贫的，就一样任他吃了。因为有政府的资本家的强力来保庇，所以凶狡的没良心的，可以青天白日张口吃人，忠厚的有良心的清白平民就无噍类了。

救命呀！政府吃人，资本家吃人。我们平民的穷命贱命，一天不知送掉多少！努力去耕田做工做商，月月年年，辛辛苦苦，来捱那毫无趣味的残生，如何得了。救命呀！只有革命是救命的唯一方法！

甚么叫做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又叫经济革命，和从前的政治革命不同。经济革命固然先要把吃人政府推倒，更要把吃人的资本家都铲清光。以后不许某人得有私产、不做工的不许吃饭，其余间接吃人的伪道德伪名教，一律肃清；那么，我们清白的平民，只有做工吃饭，吃饭做工，绝对自由，极端平等。做教师学生的呵！你们读书讲学，要预备做工吃饭的资格，不要求得一点学问去做政府资本家的走狗。当兵的呵！你们要将好身手，预备铲除政府资本家，为平民作前驱，为大群幸福去牺牲，不要帮助政府资本家来吃人。做农的呵！你们结合团休，自耕自享，田地是天然的，劳力是伤自己的，纳税与政府，纳租与田主，就是把你的膏血供他喝、把你的骨肉供他吃了。

做工的呵！你能建屋，你就应该住好的；你能织布，你就应该穿好的；你能做种种物品，你就应该享受至大的福。为什么你们如今苦至这样呢？你能联合起来，把原料机器抢回自己手里，谁还敢刻薄尔呢？

失业的游民呵！你能够不懒惰，能够合大群去征服资本家，那时土地田园工厂物料机器都是公共的，你一定有工做，再不会失业了。

一切的人听呵！社会革命不是皇帝换过大总统的戏法，是我们救命的方法，世界人人都要一齐动手的。来啊！来啊！早一天动手，早一天救命。

---

<sup>22</sup> 这篇文章和下一篇文章都是民国时期的安那其主义著作



## 6. 令子令孙断断有饭吃

我从前看见一本曲本里头，说有一个很吝啬的富翁，碰着人劝他做好事的时候，不但不答应去做，并说照你这个样子连子孙都要没有饭吃了。劝的人问他，你相信你的儿孙能彀<sup>23</sup>顿顿有饭吃么？他说不敢（原文如此）舍子舍孙断断有饭吃。这一段话看了的都笑，但是不理睬子孙吃饭的问题的人有几多呢？现在听见废止财产承继制度就要怕起来的不是狠多么。我们且不向少数的青年讲，且问一问他们多数的人，假使给你十万万的家财，你们令子令孙实在能彀断断有饭吃么？试想一继承你的宗祧，拜你的坟墓的固然是子孙，女婿也是半子，女儿的儿女也是外孙。比方一对夫妇生出儿女三个，到孙辈便有九个了，到曾孙辈就有八十一个了。这许多孙，你无论遗留什么财产，总有一天是于净的、是会接续不来的，那个时候令子令孙就没有饭吃了。况且这个只算你的子孙都是狠安分的来讲。如果他不安分起来，你还没有死就在外头借债，明写着严亲绝气，本利清还。你死了不到三五年，早已一个大钱都化干净了。那个时候恐怕你老人家还是断断无他技。就算你的儿孙不坏，世界还有坏人哪！偷的、骗的、有意的、无意的、直接的间接的、官司、寇盗、水火那一件不是可以把你吃饭的钱财剥去的，你能彀都止住他不来侵犯你么！还是你这个官厚的人，首先要这些军官匪骗的敲诈去了钱，还要赔命，他不杀你，你还要饿死，那个时候令子令孙也没有饭吃了。又不讲这些天灾人祸，就拿平常的营生来说，随你拣一百有钱的人，问他祖上有几个个是一直都有钱的呢？并拿一百个没有钱的人来讲，他的内外长亲没有一个曾经有过钱的几个个呢？把他平时的情态来说，放债就会收不起，买田就会碰着没有收成，做买卖又会因货价涨落亏本，放在最坚实的银行也会倒帐，简直叫做世界没有可以放钱放得安安全全的道理。这样想来，令子令孙还是不能断断有饭吃。照这样讲，是不是凡有人的子孙都不能断断有饭吃的呢？能的，不过不要把钱来传给儿孙。本来人是应该替子孙想吃饭的方法的。他这一生一世都只管顾着子孙吃饭是一种好处，不是坏处。常人往往说，莫替儿孙作马牛，这是错的。我们没有祖先的做马牛，自己能到这个地步么！要人类向上，不是一天可以办得到的。人类向上的结果，不是在那里用力的人可以见得到的。所以，凡有能彀使人类向上的努力，都是替儿孙作牛马。我们有了无数做马牛的祖先，才能彀有今日。我们也要对将来无数的儿孙负一个做他们马牛的义务。（但是做马牛和做强盗不同，应该分别）如果大家只做乘马服牛的聪明圣人，不做牛做马，那一代两代前人的贻留用完了，差不多人类便要吾世而斩了。所以我想变换了这个成语说，应替儿孙作马牛。作马牛的内容不止一种，穿衣、住屋、读书、走路都要替他做工夫的，却是吃饭又比这几种事情要紧。所以不特你们要求子孙有饭吃，我们也希望令子令孙有饭吃。但是，你们积财产的子子孙孙断不能个个有饭吃是已经明白的了。请你想想，这个不能从什么地方来，不是因为只有少数人有钱，多数人没有钱么。如果人人有钱，用不着做骗子、做强盗了，用不着做兵，做匪了，也没有赌钱、放债，也没有娼寮、诱奸了。还有不能的就是个人只管自己，不管人家。所以，做生意的亏本也没有人肯赔他，遇着天灾人祸也没有人肯救他。甚至于抢他人的、骗他人的钱都是想积起给子孙的。那晓得世界钱财是狠少的，人类享用是狠多的，打个坐食的算盘一定是不能教。所以，要积起钱财来叫子孙有得吃就顾不得别人，不特顾不得别人，连自己的儿孙也是顾得了一个吃饭，就损那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个儿孙弄得他们没有饭吃了。本来同是你的儿孙，你断不会分出这一个该食，那一个不该食，却是弄到后来真是其豆相煎，这是何苦来呢？所以，这些只管自己儿孙食饭的，一定不能彀保的几环食饭。多数人没有钱，自然也不许少数人永远有钱食饭，这便是现在打算子孙食饭的所以艰难的原故了。然而古人也有说不叫子孙有钱的，为什么行不去呢？因为子孙没有钱便要做工来食饭。你们第一是，怕子孙没有会做工以前和已经不能做工以后，没有饭食。第二是，怕子孙只管会做工，仍然没有饭吃。这些都是现在社会里头必然的事实。我们只管出去一看街上三岁小孩、八十岁老婆有讨饭的，他们能做工么？现在不是许多壮年的工人也是空闲着找工做找不到么？因为，他熟这一门不熟那一门，人家偏偏找

<sup>23</sup> 够。

那一门工，不找这一门。他的食饭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你们想要子孙靠做工食饭，也不能断断有饭食是不错的。然而，你们也没有方法，只希望多积一点钱财，多养他们几年。这个方法不中用，是上头已经说明的不用再说。现在，所问的只是还有别的方法保证他们有饭食没有<sup>24</sup>。既然晓得多数人没有钱的时候，少数人有钱也不能食饭，不晓得有不能做工、无工可做的时候，虽想做工食饭也不能彀，那就当然可以想得到，假如我们的子孙把钱财当做公共的，能做工的人养不能做的人<sup>25</sup>，有工做的人养没有工做的人，岂不是子孙食饭就稳固得多么。从前喜欢说九世同居不分财产的话，不就这样么。这个团体越大，子孙有食一层越发靠得住。所以，我们的子孙，如果肯和别个人的子孙合起来，做这个九世同居不分财产也是愿意。不讲九世就是九百、九千世也愿意的。不止两个家族，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乃至世界全人类，如果办到九世同居不分财产，在者安之，老者怀之，死有葬，疾有养，那些话你以为是好呵还是不好呢？老实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底下我们的子孙，只要人家有饭食，有衣穿，他决不怕来饿。只要世界永远进步，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子孙都能享受的。他们的生活比我们现在强多了，你们不希望儿孙是这个样子么。共产主义就是能没保得将来人类永远有饭食的主义。将来的人类，就是我们的子孙也是你们的子孙。我们你们的区别，到那个时候，或者已经去掉了。子孙的分别，到那个时候，也只是历史上名词了。但是，我们拿现在的话来讲，我们仍旧在你们面前保证一句：

听我们的话，令子令孙断断有饭食。

请看了的人，送给别一个人看。

请晓了的人，读给不晓的人听。

请批评我的人，另外做一篇更好的。

## 7.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sup>26</sup>

1871年3月至5月的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在此一显身手，所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流派都为此滔滔不绝地辩论、误导，都以此指导、修正、影响自己的实践。其中最主要、最有影响的见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流派，特别是在中文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巴黎公社的见解是唯一的话语源。可以说，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理论”。今天，在苏联解体和向中国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等作出一个基本判断了。

在1871年4-5月写于伦敦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欢叫道：“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4月12日，马克思致函库格曼：“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

<sup>24</sup> 原文错误写成了：所问的只是还有别的方法保证他们有饭食一没有层。此处改正了这个错误。

<sup>25</sup> 原文：能做工的人养不能的

<sup>26</sup> 赵京《巴黎公社悲剧的意义》

考虑！”

马克思的论断，主要是基于丰富的想象力以符合自己的论点，与事实不符，有必要先简单叙述公社的成立过程。

导致巴黎公社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法国在 1870 年 7 月由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挑起的普法战争中的惨败。1870 年 9 月 2 日，被围困在色当的拿破仑三世投降，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9 月 4 日，巴黎爆发革命，宣布成立第三共和国。全国选举（男子普选）后，由共和派和奥尔良保守派组成新的“国防政府”，梯也尔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但普鲁士继续大举进攻法国，9 月 19 日，普军包围巴黎。多年来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再加上当前的食物短缺、军事失败，还有普鲁士军队的不断炮轰大大激化了社会各界的不满情绪。巴黎市民，特别是下层市民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民主的共和国，在普选后比较明确的要求是巴黎应该自治，拥有自己的经选举产生的议会，享有与其它法国城镇同样的权利，而这一要求一直被政府出于对激进平民的担心而拒绝。同时，大量涌入巴黎的穷人开始把自己的经济地位与法国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产生了谋求以一种更加公平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经济的愿望。共和、民主、平等、自由的普遍愿望变成了朦胧的社会主义理想。

1871 年 1 月，围城四个月，临时的国防政府谋求与新宣告成立的德意志帝国签订停火协定。德国人要求在停战协定里加入一条，要让德国军队以凯旋仪式进入巴黎。许多巴黎市民还是非常愤慨并坚决反对普鲁士人以任何仪式宣布对他们的城市的占领，有数万巴黎市民组成“国民自卫队”以保卫城市。特别是巴黎下层民众无所畏惧，准备好在德军进城后引发的武装冲突中血战到底。自卫队选举了他们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包括共和主义者雅各宾派、布朗基激进革命派和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派等。他们对外共同保卫巴黎击败德国人的进攻，对内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对抗在 1871 年 2 月举行的一个支持帝制的多数党的选举。在德军进入巴黎之前，依靠普通市民的协助，国民自卫队已经设法把一大批大炮保存在一些相对安全的地方，主要的大炮放在蒙马特尔高地。

德军进入巴黎之后，老练的首相俾斯麦看到巴黎的高度政治狂热，说巴黎的城市自治要求“并不过分 not so unreasonable”<sup>27</sup>，很快便撤离出巴黎，在郊外屯兵静观，同时保护逃到凡尔赛的梯也尔临时政府。法国首都出现了权力真空后，中央委员会的权威稳定地增长，梯也尔害怕中央委员会形成另一个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中心，感到再也不能允许中央委员会自由支配那 4 百多门大炮。3 月 18 日，梯也尔命令政府军去夺取存放在蒙马特尔高地及其它地方的大炮。士气低落的政府军士兵们不但没有执行命令，反而与阻止士兵的国民自卫队和当地的男女老幼共同处决了政府军军官。政府军的其他很多部队也参加了叛乱并迅速扩大，梯也尔只好命令军队、警察以及各级文职行政人员们立即撤退巴黎。

3 月 18 日，公社还没有诞生，马克思说“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是自己的创作，但人们把这一天作为巴黎公社历史的开端。作为巴黎唯一的权力机构，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立即组织了 3 月 26 日举行的巴黎“议会”的选举。马克思说教“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批判巴黎民众“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又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把公社的现实和理想变为一种马基雅维里式的政治计谋，贬低了公社的意义。

90 名当选的“议员”包括了很高比例的技术员和专业人员（比如医生和记者）。他们才是公社的政治活跃分子，派别从共和派改良主义者，到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安那祺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蒲鲁东派），还有希望恢复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时期专政的雅各宾党人，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机构，更接近马克思术语“（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有 64 人担任议员，加上 4 月 16 日补选的 17 人，共有 81 名议员。其中 18 人来自中产阶级、约 30 人来自专业阶层（主要是共和派的报纸记者）、35 人来自体力劳动阶层。议会中有 19 人来自中央委员会，最有能力、热情、经验和影响，其中有 7 人属于雅各宾派、4 人属于布朗基派、3 人属于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他们的职业为：6 名技术员、6 名工人、3 名商人、2 名专业人员。29 巴黎公社于 3 月 28 日

<sup>27</sup>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 1.

宣布成立，但各区经常在围城中与公社议会脱离关系。

以“祖国在危机中！”<sup>28</sup>为旗号的布朗基被选为议会主席，但他本人已经于3月17日被捕，整个巴黎公社期间他都被关在一个秘密监狱。公社一开始试图用巴黎总主教达尔博伊来换他出狱，后来又用他们拘留的74名人质交换，但均被梯也尔断然拒绝。布朗基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最理想的社会，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人民的愚昧是通往共产主义的两大障碍，而扫除愚昧靠教育，扫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必须依靠少数革命家的密谋和暴动。如果没有巴黎公社，布朗基可能变为第二个“为平等而密谋”的巴贝夫，不具有世界范围的影响。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处于竞争意识竭力诋毁布朗基，称“阶级专政优于革命家专政”，但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如果实行得人道、公正的话，正是布朗基主义的实践。

马克思把巴黎公社想象为自己思想的社会实验室，以他主观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模型和将来社会的雏形来歌颂、判断它，但他本人远离欧洲大陆，并没有把握巴黎的实情。《法兰西内战》的书名本身就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悲剧的偏见定义。十年后，马克思与流亡的公社成员们发生分歧，指责公社的绝大多数成员不是社会主义者，知道公社根本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政府的尝试。

不幸的是，马克思的误判被后来的恩格斯放大。恩格斯1891年3月18日在巴黎公社二十周年纪念日子于伦敦发挥道：“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那里，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

“首先就要把全部权力最严格地、独断地集中在新的革命政府手中。正是由这些布朗基派占大多数的公社，在实际上是怎样做的呢？它在向外省的法国人发出的一切公告中，要求他们把法国的所有公社同巴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自由的联邦，一个第一次真正由国民自己建立的全国性组织。”“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sup>29</sup>——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

“浪费了宝贵时间”去组织民主选举而不是迅速地消灭凡尔赛军、没有毫不犹豫地全部没收（抢劫）银行的资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出来的巴黎公社“教训”。但是，巴黎公社不是为了夺取法国的国家政权而成立的，它不可能为了夺取国家权力而发动内战。**没收了银行的公社怎么可能向所有法国的城镇呼吁建立自治的联邦呢？**公社议员为避免谴责而全体一致选择不去没收银行的资产，正好说明公社为了捍卫自由、自制的高贵原则不惜牺牲自己。**如果每一次城镇或区域革命都以没收（抢劫）银行开始，革命不就成为犯罪的同义词了吗？什么样的人 would 参加或抵抗这样的革命呢？**据从3月6日到5月29日一直留在巴黎的 Pembroke Fetridge 于同年8月在巴黎写出的历史中记载，有5百士兵的政府军第12连队当时一直没有离开巴黎、守卫着法国银行。只是到了最后，在5月22日，公社才在得到银行（哪怕是被迫）同意的条件下，半强制地取出70万法郎支付国民卫队的薪水。其实，公社的领导人人都知道，在凡尔赛政府和德国的双重军事包围中，没有法国其他城镇、乡村的支持，他们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不可能像远离巴黎的马克思和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那样异想

<sup>28</sup> 布朗基：《祖国在危急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sup>29</sup> 恩格斯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天开地夺取全国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的精神具有普世价值，值得各种类型、规模（而限于争夺国家政权的战争）、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抵抗运动（从 1921 年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到 1989 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西方的各种反战运动等）借鉴，正是因为他们要求的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天赋”社会权利，而不是任何非分的压制、欺骗别人的政治权力。

恩格斯论断到：“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他马上转换话题，利用巴黎公社为自己的打算开路：“近来，社会民主党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就吓出一身冷汗。好吧，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sup>30</sup>恩格斯在这里为了与社会民主党人论战，提出了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与巴黎公社的实际的社会政策和性质相离甚远。公社在它短暂的生命期内采用了从前被废弃的法兰西共和国历，并采用象征社会主义的红旗以及第二共和国时期装饰有红边的三色旗作为自己的象征标志，恢复了在第二帝国时期被禁唱的《马赛曲》为国歌。尽管内部有许多不同，议会还是在管理一个两百万人的城市的基本公共事务方面做的不错；它也能够有一些政策上达成一致，倾向于建立一个进步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它们包括：

政教分离法令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变为公共财产，并且把宗教教育从学校中去除；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一直等到 1880-81 年费里法和 1905 年法国法律才重新实行这一法律，它们确立了法国的政教分离原则。公社允许教堂继续从事宗教活动，但条件是必须在夜间向公众政治会议开放，与街道和咖啡店一起，成为了公社另一个主要的共同分享的政治中心。其它计划中的立法还包括教育改革，免费提供教育和技术培训。

一些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继续了 1789 年和 1848 年的政治主张。例如，4 月 11 日创建的“保卫巴黎和护理伤员妇女联盟”相信她们针对男权制的斗争只能在一场全球的针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之中实现，要求性别平等、工资平等、妇女的主动离婚权、世俗指导（非牧师的）权和女孩的专业教育权。她们还要求取消妻子与情妇之间、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的权利差别，废除妓女、关闭官方妓院。妇女联盟还参与了几个市政委员会以及组织了合作工厂。“蒙马特尔高地的红色处女”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失败后被送到新卡里多尼亚，象征着数量很少的妇女在起义事件中的积极参与。

免除在围城期间所欠房租（在此期间支付实际已经被中止），废除数以百计的巴黎面包店夜班，向在服务期间死亡的国民自卫军的未婚伴侣以及子女发放抚恤金，由城市当铺免费发还所有在围城期间被抵押的工人的工具以及最高价值 20 法朗的生活用品（防止技术工人在战争期间被迫典当了他们的工具）。

推迟商业债务的偿还，废除借款利息，由工人接管并运营被原主人放弃的企业（将来业主可以接受补偿），等。

公社议会也完全支持国际主义，认为纪念拿破仑一世胜利的旺多姆圆柱是一个波拿巴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象征，将其拉倒。

对于常备军（以及征兵制）和警察的废除，符合安那祺主义的团体及个人之间的自由联合的社会理想。不过，在公社的特殊情况下，主要是因为国民自卫队同时负起了军队（对外）和公安（对内）的职责，废除常备军更具有呼吁法国别的城镇联合对抗临时政府军队的含义。对于废除官僚制度，特别是官员的高薪，也更具有临时的战争措施性质。最近的研究表明被马克思主义流派所称规

---

<sup>30</sup>我在这里不得不大量引用原文，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要求的：“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歪曲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并且丝毫无助于通俗化。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谈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使读者能够独立地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

定公社委员最高（国民自卫队总司令）年薪不超过 6 千法郎“相当于当时巴黎中等收入工人的年收入”的“公社原则”并不确切。当时一个巴黎男子的平均薪水是一天 5 法郎（没有参加战斗的自卫队员一天拿 2.5 法郎），一年（工作 3 百天）是 1,500 法郎左右，而一个烟草工厂经理的年薪是 4 千法郎，他的助手是 2,800 法郎。现在，实际上与国家权力结合的私营企业的官僚的高薪才是问题的关键，靠选举上台的政治官员在任职期间可以拿不多的薪水（极端的富豪可以不拿薪水），而在下台后去私营企业任职谋取高薪。

公社领导们的工作负担非常大。人们期望议会成员们不是“代议”，而是被委任（随时可以被选举人撤换）来同时担任立法、行政（特别是军事行动）和司法的职能。这样的制度正是基于自由联合的安那祺主义的社会组织模式，特别适合于日常生活中的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各种社会关系。各地区议会和大量的在围城期间为满足社区需要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小卖部，急救站等）通常也在当地居民的要求、指导之下直接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与公社议会的正式改革条令相比，公社的普通成员们更加激进，不管他们属于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第一国际的社会主义以及更多的自由主义共和派。在这种政治趋向的多样性、高度的员工自制和不同革命派别之间的紧密合作中，我们到处可见安那祺主义的主动自发的、直接的社会民主实践。为什么马克思等人就看不见呢？

不过，在国家政权以及整个统治阶级逃出巴黎的情况下，至少还可以实施已经大为折扣的“普选”<sup>31</sup>、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90 位被选举的委员中，有 16 位温和派人士拒绝就任。公社 4 月 16 日马上进行补选，但只有四分之一的有权者投票）。但在恩格斯“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的列宁，发挥得更偏离巴黎公社的实践。在《国家与革命》<sup>32</sup>中，列宁抨击到：“无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图把巴黎公社宣布为所谓‘自己的’，说它证实了他们的学说，然而他们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对这些教训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具体政治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连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都没有提出过。”但巴黎公社的意义不在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两个”俄罗斯政治家列宁最关心的“具体政治问题”，安那祺主义当然没有兴趣为此杜撰出“一个比较接近真理的答案”。虽然列宁也谈到“尽管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分成许多宗派，公社还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它说明无产阶级能够怎样同心协力地实现资产阶级只能宣布的民主任务。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没有经过任何特别复杂的立法手续，就切切实实地实行了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废除了官僚制度，实行了官吏由人民选举的制度。”他却设定与巴黎公社无关的答案：“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任务结合起来，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错误。”“两个错误葬送了光辉的胜利果实。无产阶级在中途停了下来，没有‘剥夺剥夺者’，而一味幻想在国内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使全国团结起来完成全民族的任务；没有夺取像银行这样的机构；蒲鲁东主义者关于‘公平交换’等等的理论还在社会主义者中占统治地位。第二个错误是无产阶级过于宽大。本来应当消灭自己的敌人，但是它竭力从精神上去感化他们。它贬低了国内战争中纯军事行动的意义，没有向凡尔赛坚决进攻，以便在巴黎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俄国“社会民主党能够打破年轻的无产阶级所抱的‘全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幻想，在社会民主党直接参加下迫使沙皇发表了十月十七日的诏书之后，无产阶级就鼓足干劲着手准备革命的下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武装起义。无产阶级抛掉了‘全民族的’幻想，把自己的阶级力量集中在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兵代表苏维埃等等的手中。尽管俄国革命面临的目的和任务与 1871 年法国革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俄国无产阶级还是采取了巴黎公社首先运用的斗争方式——国内战争。”这是对千方百计避免内战的巴黎公社的肆意曲解。

国民自卫队先于 4 月 2 日与凡尔赛政府的常规军的展开了一场小规模冲突，但双方都没有真正地想要开始一场大规模内战。抵抗与求生变成了公社领导层首要的考虑，他们要把国民自卫队变成一支有效的抵抗力量。在国外，包括德国在内的工会和社会主义组织也举行了集会和并传递了支持

<sup>31</sup> 3 月 26 日的选举有 229167 男子投票，比 2 月 8 日的 30 万多人投票的普选少。当然，时间上短促也是一个原因。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 69.

<sup>32</sup> 《列宁全集》第十三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 7 月第 1 版。

信息，但所有从其它法国城市获得真正帮助的希望很快破灭了。梯也尔阻止任何信息从巴黎泄露出去，里昂和马赛等城镇的公社运动很快就被粉碎了<sup>33</sup>，而法国外省及乡下对于大都市的运动一直以来就持一种怀疑性的保守态度，不予支持。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议会的一个分支赢得了一场选举，决定创建一个“公共安全委员会”，与1792年雅各宾派建立的机构同名。从理论上来说它的权力非常大，但实际上巴黎公社的民众无法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红色恐怖，“公共安全委员会”几乎没有发挥作用。

从4月到5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数量上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法军战俘以帮助梯也尔政府），达到13万人，完成了对巴黎外围抵抗力量的分割包围，并将国民自卫队赶回城里。5月21日，巴黎城墙西部的一道城门被攻陷，凡尔赛军开始夺回巴黎。他们首先占领了繁荣的西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那些没有逃离巴黎的中上层市民们的欢迎。凡尔赛军拥有集中指挥和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他们已经学会了巷战的技巧，只需简单地把房屋的墙壁凿穿就可以完成对公社街垒的侧翼包抄。而公社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计划的防御，每个街区为了自己的生存各自为战，最后被一个接一个地攻破。5月23日，政府军通过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攻陷蒙马特高地。当天晚上面临失败的公社政权下令纵火烧毁巴黎，被烧毁的建筑包括波旁王朝和第二帝国的王宫和与其相连的卢浮宫（部分被毁）、法国参议院、内政部、财政部、司法部、巴黎市政厅等。6名人质（包括达尔博伊总主教）于5月24日在监狱被枪决。

在进攻中，曾经拿过枪的公社战俘，或者被怀疑为曾经战斗过的人士，都被政府军立即枪决，集体屠杀成了家常便饭。在最后的流血周及随后的凡尔赛军的大处决中，最顽强的抵抗发生在东部的工人阶级区，战斗一直持续，直到最后的巷战。到5月27日，只有极少数的抵抗仍在持续，数千名政府军围攻并屠杀了退守在巴黎东北的拉雪兹神甫公墓的最后2百名公社战士。战斗到5月28日全部结束。

严厉的报复随即展开。以任何方式支持过公社的行为都被视为政治犯罪，成千上万人被临时拼凑的简易军事法庭判决并枪杀。另外还有将近几万人被押往凡尔赛接受审判。男人、女人和儿童排成长队在军队的监视下经过几天几夜的长途跋涉去往凡尔赛的临时监狱。在流血周期间有15083人正式被捕<sup>34</sup>，但死亡人数一直无法得到准确的数字，估计从1万到5万人。据Benedict Anderson说：“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大约20,000人被处决”。记者Edmond de Goncourt三天之后写道：“血腥镇压非常彻底，象这样杀死所有敢于反抗者的流血事件，将推迟下一次革命爆发的时间。……旧社会至少为自己又争取到了二十年的和平时间。”<sup>35</sup>1872年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以防止一切革命组织产生的可能，巴黎继续保留军事法律达五年。对于被监禁、流放的公社社员，法国政府直到1880年才实行了大赦。

数千名巴黎公社成员（包括大部分的公社领导者）逃亡到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其中最有名的是在公社失败后才驰名历史的欧仁·鲍狄埃（1816年10月4日—1887年11月6日）。鲍狄埃出身于巴黎的一个工人家庭，曾参加1848年的二月革命和六月起义，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后当选为公社议员。公社失败后，他躲藏在阁楼中写出《国际歌》的歌词，表达了公社为之奋斗的理想和激情。我们都很熟悉的萧三译文，但只有第一、二、六段，这里录出第三段：“压迫的国家、空洞的法律，苛捐杂税榨穷苦；富人无义务独逍遥。穷人的权利只是空话，受够了护佑下的沉沦。平等需要新的法律，上写：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同样地，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sup>33</sup> 著名的“怪人”George Francis Train 在他的传记 *My Life in Many States and in Foreign Lands*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2) Chapter XXV *The Share I had in the French Commune* 记述他在马赛与公社的奇遇，对他而言，“红色共和”像一场闹剧。

<sup>34</sup> 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 p. 171.

<sup>35</sup> 与1989年天安门悲剧时邓小平的“杀20万学生换20年太平”（《华尔街日报》引用李光耀与邓小平的会见。《海峡时报》也报导李光耀提到，邓小平曾说过“如果我不得不杀掉20万学生，以换来中国100年的稳定，那就只能这么做。”）多么相似！正是邓小平完成了中国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



第四段：“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他们除了劳动，还抢夺过什么呢？在他们的保险箱里，劳动的创造一无所有！从剥削者的手里，我们只是讨回血债。”第五段：“国王用烟雾来迷惑我们，我们要联合向暴君开战。让战士们在军队里罢工，停止镇压，离开暴力机器。如果他们执迷不悟，让我们英勇牺牲；他们将会知道我们的子弹，会射向我们自己的将军。”

巴黎公社的悲剧，对于法国和欧洲都提供了沉重的直接历史教训。法国由此告别了内战性质的革命，包括力图“重建公社”的布朗基派也承认、参与以普选为标志的共和体制内运作（布朗基 1879 年 4 月在狱中被选为法国议会议员）。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和主力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的高足考茨基（被列宁冤枉地骂为“叛徒”）等理论家的影响下，始终避免与施行了普选的国家权力作正面的战斗。即使从政治层面上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失败的德国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体制远比本来属于战胜国的俄国在战后的内战和饥荒更人道、民主、自由。1921 年 3 月 18 日，通过解散制宪会议引发内战而确立起一党专政（最坏的“布朗基主义”变种）的布尔什维克，在血腥镇压了巴黎公社的继承者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sup>36</sup>后，集会庆祝巴黎公社 50 周年。逃亡在彼得堡的安那祺主义战士柏克曼、古尔德曼不由得质问列宁这个梯也尔的传人：你有资格谴责（至少靠普选上台的）梯也尔吗？那些所有号称“共产党”的独裁者（从斯大林到金正日），你们比梯也尔罪恶百倍！

对作为社会解放雏形的巴黎公社，经历过 1848 年布拉格和 1849 年德莱斯頓市街战的巴枯宁对结局看得很清晰。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巴枯宁就判断普鲁士的胜利会把欧洲的社会革命拉向倒退半个世纪。<sup>37</sup>1870 年 9 月 28 日，以巴枯宁为首的社会革命家们占领里昂的市政厅，宣告成立法国安全委员会并发布条令，希望别的城市的呼应，共同废除国家，进一步引发德意志境内的革命。类似的起义也发生在马赛、布莱斯特等城镇，但都很快被资产阶级的地方或政府军警镇压下去了，因为法国广大的农村和穿军装的农民士兵们很容易被政府利用。在 4 月 5 日致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不管任何可能，巴黎都会失陷，但他们不会白白消灭。”但是，“与权威共产主义的说教相反，……巴黎的社会主义者们相信只有通过人们自然发生的、持续不断的大众、组织和协会的运动，才能达成或带来革命的完全实现。”正如安那祺主义者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用权威的手段控制第一国际一样，任何从事社会公共事业的个人和组织都不应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与因为内部纠纷被马克思解体的第一国际（即《国际歌》中的“英特纳雄耐尔”）<sup>38</sup>不同，被国家权力镇压的巴黎公社，正是被马克思主义流派嘲笑的“仁慈”、“良心”、“诚实”、“树立一种最高的公理”、“过于宽大”等政治“错误”，才体现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永垂不朽的人性。<sup>39</sup>政治上的失败是暂时的，我们正是通过追求崇高的社会理想的自我牺牲的过程，向人类显示不同于既往的社会秩序，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准和文明规范。

换一个角度来看，法国改良派社会主义先驱 Malon 在 1971 年 3 月 17 日回到巴黎，18 日晚与包括市长在内的由选举产生的巴黎官员一同与国民卫队的中央委员会谈判，19 日晚到达 de Ville 旅馆，希望国民卫队退出旅馆，由这些选举出来的官员代表巴黎与凡尔赛的国民会议谈判。在遭到国民卫队拒绝后，市长 Favre、Malon 等人发表抗议宣言，但 Malon 仍然没有放弃和谈的希望，23 日作为巴黎的代表之一赶往凡尔赛的国民议会，受到少数共和左派的欢迎，但国民议会的多数派拒绝谈判，迫使 Malon 站在巴黎一边。Malon 在 26 日的选举中与其他 22 名国际劳工协会的成员当选为 17 区的公社成员，与 Pierre Denis 等起草了不少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议案。在后来的回忆和纪念文章中，Malon 对于争夺公社主导权的布朗基派、雅各宾派等深刻批判，特别反对公安委

<sup>36</sup>克朗斯塔特水兵们的“权力归苏维埃”要求 本来正是列宁上台的口号，不过布尔什维克专政后，感到苏维埃妨碍他们的权力。

<sup>37</sup>以下的引用来自 G. M. Stekloff, *History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28, reissued in 1968. p.191-194. 这是关于第一国际最全面的的历史（译自俄文第三版），虽然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史观，却用约一半的篇幅相当客观地叙述安那祺主义的活动事实，提供了很多难得的历史资料。

<sup>38</sup> 他们眼看不能控制国际，就把总部迁往没有社会主义基础的美国，远离欧洲大陆。但他们缺乏基本的诚实，当他们的忠实门徒要求把国际的资料转往纽约时，也遭到马克思的拒绝。

<sup>39</sup>（这是作者说的）每当我反省被北京、东京等国家权力出卖的 1989 中国民主运动，从来没有后悔“仁慈”、“良心”、“诚实”为自己带来的命运。如果再来一次革命，我们还会选择自我牺牲的方式来改造社会。



员会的独裁性质，因为那是对激发民众对公社的激情的背叛；同时，出于巴黎公社的亲身经历，Malon 虽然赞同反权威的 *federation* 自由联合、接近安那祺主义者，但在国际中力图调和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冲突，没有被马克思开除出国际<sup>40</sup>。其实，马克思 1881 年 2 月 22 日在回答荷兰社会主义者 *Ferdinand Domela Nieuwenhuis* 关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劳工政府的问题时，脱离了自己的理论，更象一个现实政治家：“你可能会指出巴黎公社的例子。但除了这只是一个城市在特殊情况下的反叛的事实，公社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但是，如果能够有少量的坚实常识，他们可以与凡尔赛达成有利于整体人民的妥协—这是他们当时唯一能够做到的事”[38]。既然马克思已经这样说了，恩格斯和列宁还要发明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干什么呢？<sup>41</sup>

巴黎公社的基于包括草根阶层在内的人人参与的直接民主和基于自由联合的公正、平等社会交换与博爱的方式，是人类永恒的价值，是建立新社会生活的基石。我们在人类历史的每一次有意义的民众的自发的社会改进运动（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乌克兰马克诺运动、西班牙内战、芝加哥干草市场就义、美国民权运动、天安门悲剧、墨西哥原住民起义、世界社会论坛等）中，都看到巴黎公社的光芒。

---

<sup>40</sup> K. Steven Vincent, *Between Marxism and Anarchism: Benoit Malon and French Reformist Soci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P.29-38.

<sup>41</sup> Werner Blumenberg, *Karl Marx: An Illustrated Biography*, Tran. Douglas Scott, Verso, 1998. ix & p.142.

## 8.巴枯宁、安那其集体主义

如果说第二国际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裂而告终结的话，第一国际就是以马克思与巴枯宁的分裂而告终的。尽管在这两人的追随者间掺杂着不少个人的争权夺利，但他们两个人都明白彼此之间的原则差异决不可能弥合。今天看来，他们的差异有两层含义：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上看，马克思是英明的；从社会哲学的理念来看，巴枯宁坚决反对以权威主义的政党形态创建自由社会的企图，“我唾弃共产主义，因为它否定自由，剥夺自由的东西决不是人性的东西，共产主义把社会的所有权力都集中起来，必然会在国家的权力下把财富也集中起来。我则希求国家的废止，彻底扑灭权威的原理和国家的教化。国家在把人道德化、文明化的借口下，压抑、榨取人，使人奴化、堕落下去。”由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无政府主义者对全权主义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警告是多么英明！

恩格斯稍后论述到：“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以下认识上是一致的：社会革命到来之际，政治国家以及与其相随的政治权威的消亡、即公共机能丧失政治的性格、变为单纯的监视社会利益的行政机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在权威主义的政治国家的成立条件还没有消除之际，要求一举废除这些社会条件，即革命的序幕就是废除权威。”这就是无政府主义的最大乌托邦贫血症！“废除权威”本身就要求人类最大的权威！那么马克思先生确实实际一些：由一个能够废除自身权威的阶级——无产阶级，来废除旧的权威。在这一点上，巴枯宁的指责很准确：马克思所幻想的无产阶级是哲学思辨和经济学推理的产物，蒲鲁东则生活在现实的无产阶级之间，深知他们自身的弱点不足以担负起这个废除权威再自我废除权威的历史使命。可笑的是，列宁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怎么办》中又把“灌输”知识给无产阶级的使命交到知识分子的“先知”（如马克思和他本人）身上，背离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直接期待，仿佛回到其俄国同胞巴枯宁的立场上了。

从共产主义全权形态中表露出来的对权力的服从只是整个现代社会演进的一个侧面。从产业社会以来，不断涌现出对近代民族国家、爱国主义的礼赞：洛克、黑格尔、孟德斯鸠、韦伯，一直到当今的帕森斯，都把自己的使命定为使国家机器更加权威、合理、精密、机能充实。但国家权力的统治现实却远离了“三权分立”提倡者们的理想。当今世界上，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中国、日本，行政权即政府统治个人的权力高居于立法、司法权力之上，靠立法权来制衡行政权力、特别是国家暴力对个人自由压抑的期待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谈。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生产领域对劳动者的压榨，还是共产主义制度下通过分配领域对国民的剥削，其共同实质都是通过国家的强权来实现的。

个人在这种暴力之下越来越无能为力，只能采取屈服、盲从、欺骗、出卖人格的方式才能生存下去，这在中国社会的现实中表露得最清楚：国家权力、即镇压之权非常强大，它拥有摧毁人类的能力，它供养了一大批国家“公仆”，靠国家的名义寄生国家的腐蚀越深，被腐蚀越深的国家更加深了对个人的支配。从最大的官僚到最没有权力的平民，都被国家政权这个撒旦治服得没有一丝反抗余地，只好以最卑劣、可怜的方式逃避国家的强权。本来，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今天，一党专制的中国现代奴隶制度更是对社会主义的践踏。在社会主义已经被出卖、滥用，连“消亡国家”、“废除边界”、“废除常备军”、“全民就业”、“各尽所能，各取基本所需”等“国际”的基本原则都被遗弃的今天，安那其主义更能号召全球人权、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真正社会主义精神。

回到我们的要讲问题上来：巴枯宁对于国家的看法表现出很明显的唯心主义<sup>42</sup>立场：巴枯宁认为国家是外来暴力的产物。他说，一个有限国家的存在会使遭到威胁的那些个人联合起来成立国家。

---

<sup>42</sup> 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我当然不会认为只有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只机械的将社会划分为几个生硬的阶级来进行推断，是非常不科学的。

于是，人类就分裂成为彼此格格不入的互相敌视的，互相威胁著无数的国家。这就等于说，国家是国家的产物，或者说国家是那些个人和已存在的某个有限国家之间对立的产物。

巴枯宁主张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绝对自由的自由社会。他认为，自由应当是一切社会组织建立的唯一原则。社会秩序应当是一切地方的、集体的和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综合结果。而不应该是外力强制镇压而产生的结果。巴枯宁主张放弃一切强制政权，社会革命应导致任何政权原则的消灭。他主张用暴力攻击的手段去摧毁国家机构，让简单的办公厅变成服务于社会的事务所。巴枯宁认为，政治上的集中应让位给经济上的集中，因为前者会扼杀自由、个人生活及居民的自发行动，而后者则是构成文明的主要条件并创造著自由。这种没有人统治人的无政府状态，正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随着国家和一切权威的废除，巴枯宁提出，一切政治和经济组织，都不应像现在那样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按照统一的原则来组织，而应当自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按照自由联合和联邦的原则来组织。基本单位是地方公社，再由公社组成自由联邦，直至最后建立国际联邦；每个人可以自由退出公社，而每个公社又可以自由退出联邦，不受任何权威原则的干预。

对于社会革命，巴枯宁认为应该首先废除遗产继承，让一个人的贡献归于整个社会，而不是继续由他的家人占有，这样人们就可以让自己的财产归于整个社会，而防止了阶级的进一步分裂。

## 9. 克鲁泡特金、安那其共产主义<sup>43</sup>

大约自公元九世纪中期以来，直到 1613 年王族会议推举罗曼诺夫为沙皇为止，俄罗斯一直由海贼出身的诺尔曼人 Norman 族长 Rubrik 的家族统治。1842 年，在罗曼诺夫王朝下改名为克鲁包特金 Kropotkin 家族的 Riurik 直系中，诞生了令所有统治阶级震撼恐惧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彼得·克鲁泡特金。今天，当我们不是简单地否定、代替，而以扬弃、超越的眼光来看待列宁、马克思的时候，谁也不能绕开无政府主义，不能绕开克鲁泡特金。

自幼失去母亲，靠法国人家庭教师和德国人乳母抚养成长的克鲁泡特金，少年时代就目睹了主人（统治阶层）与奴隶（被统治阶层）的阶级对立。部分是受其兄亚历山大的影响，更主要受当时的农奴解放运动风潮的感染，在圣彼得堡士官生学校读书的克鲁泡特金就热衷于数学（地理学）和社会问题这两大注定为其终生从事的行业。1862 年克鲁泡特金 20 岁时作为士官加入哥萨克联队往西伯利亚从军五年，其间不断从事地理学、生物学研究，在其代表作之一《互助论——进化的原因之一》<sup>72</sup> 的绪论中，他回顾到：“青年时代当我在西伯利亚东部和满洲北部旅行时，动物生活的两种特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大多数的物种在严酷的自然中必须进行生存竞争，周期而至的生命剥夺，广阔土地上没有生物的活动……；(2)虽然大多数的达尔文主义者（达尔文自身并非一定如此）认为同种动物之间的生存竞争也是进化的主要原因，但即使在动物群居的少数地方，我却没法找到同种动物之间的生存手段的残酷斗争。”

克鲁泡特金由动物的观察联想到社会问题，首先就是受斯宾塞的影响(曾翻译过其论著)，但对于达尔文主义者将生存竞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滥用（特别是其后克鲁包特金亲身经历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于 1902 年就发表了《互助论》，从动物间的互助、原始人、土著人间的互助，中世纪都市间的互助，直到近代社会中的主要是劳动大众之间的互助，论述了人类生活中除了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之外的另一种重要特性，指出这并不仅仅是理论的空想，引论到人性中实际存在的、超越出国家权力（实际上是国家统治阶层）之间的残酷斗争的善良本性，可以克服战争这一人类罪恶。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代》周刊上登载一文，抗议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生存竞争”、“权力意志”的滥用，反对只用残酷的压迫和狡诈的欺骗语言，而要以相互协同的视点来解释生物学以及社会的进步，并要求再版《互助论》的普及版。克鲁泡特金在其序文中开首写到：“今日之战争，几乎把所有欧洲都卷入恐怖的战争中，在德国人侵入的比利时与法国的各处，都发生了前所未闻的大

---

<sup>43</sup> 本节主要引自赵京《克鲁包特金对现代社会的再启蒙》

规模地残害非战斗人员生命以及掠夺普通民众生存手段的事态。这时，那些为罪恶的战争寻求借口的人把‘生存竞争’作为一个得意的解释。……本书的基本概念，即相互扶助代表了进化的一个重要的进步因素，已经逐渐地被生物学者们所承认了。最近欧洲大陆出版的关于进化论的大部分论著都已经对生存斗争中的两种特性，即对自然逆境的物种之间的外部竞争和物种内部的对于生存手段的内部斗争，做出了区分。……不过，虽然动物间相互扶助的重要特性已经逐渐得到现代思想家们的认可，关于我的至今为止的第二个命题——人类历史中对于社会制度的进步的两个重要特性——却完全没有得到认识。现代思想的精英们，直到今天仍然主张大众是与人类社会的制度改进无缘的，只有那些在知识、政治、军事方面的精英们才可能指导愚昧的大众实行任何制度上的进步。”

“现在的大战，使欧洲的大多数国民不仅从战争的现实，而且从日常生活的繁多的结果中，深切地感受到应该变更这些流行的教义了。任何国家要想克服历史危机，都离不开民众的创造与建设的天分。那些积极备战、制造野蛮战祸的不是欧洲的民众，而是他们的政治上的支配者和精神上的引导者们。……今天的妇人见到那些在基辅城里蹒跚的德、奥军队的伤员、俘虏，总会塞给他们面包、苹果，有时也会递上铜板，并不问其是敌是友、是官是兵。……那些自发的来自英、美、俄的对于比利时、波兰的援助，都超越了‘慈善’的性质，而只是一种单纯的邻人之间的互助。所有这些同等的事实都成为新生活方式的种子，正如人类原始的互助是至今为止的文明社会的最善制度的起源一样，这一类新的事实也将导致新的制度的诞生。”

从这里，我们明显地感受到反抗人类历史上最大强权——国家——的犯罪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根源，在于人性中实际存在的同为人类的互助善良本性。作为一个真正的平民思想家，克鲁泡特金在思想上不是一个无抵抗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但在生活实践中，“克鲁泡特金象托尔斯泰主张的那样去生活了”（罗曼·罗兰）。当俄罗斯的贵族中最早接受欧洲传来的平等、博爱思想，并在为如何对待农奴而受内心谴责时，克鲁泡特金 12 岁时就抛掉了公爵的称号，并以自己的贵族出身为耻，从此以贫困和遭受迫害为伴。直到 1917 年俄国革命，克鲁泡特金才赶到俄罗斯，出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的顾问委员。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噩梦。布尔什维克政府曾经要以他的《法国大革命》作为教科书，遭到他的拒绝，他不愿意再为新的强权政治所利用，因为自反抗沙皇的斗争以来，做出了先驱性牺牲的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成为新政权的敌人，布尔什维克政府最先镇压的工人起义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克鲁泡特金专心于无政府思想源泉的哲学论著——《伦理学》，献给世界上一切被支配的贫民大众，终因健康不支于 1921 年 2 月离开人世。布尔什维克政府要为其举行“国葬”遭到其家人的拒绝后，对那些自愿参加葬礼的无政府主义者开恩释放一天。两万名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冒着政治危险参加葬礼，仪仗队前，两人高举象征无政府主义理想的黑旗，上书“立即释放所有牢狱中的克鲁包特金的战友和同情者！”

历史上所有的群众运动常常为野心家、政客、内奸出卖掠夺，无政府主义者却永远站在被压迫的民众一边，就是如克鲁包特金所坚信的那样，民众生活才是一切法律、制度的来源，在《互助论》中，这种信念已经超越普通的道德、法制约束成为一种信仰，即：生为人类，就应该信仰人类互助之爱并由此去反抗、改善人类的罪恶制度。今天，我们在日本仅仅为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尊严呼吁竟遭到北京和东京两个政权的卑劣迫害而没有变成暴力主义者正是基于这种信仰，相反，我们深深同情和理解所有的以各种形式、手段反抗国家强权的政治斗争（包括被判处死刑的“日本连合赤军”、“中核派”、“革命马克思主义派”以及菲律宾的“新人民军”、秘鲁的“光辉之路”等等），他们才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少数理想主义者。我认识几个“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大学生，是日本青年中仅有的胸怀人类社会理想的优秀青年（我并没有知识认为他们坚持的理想是片面或错误的），当日本政府破坏日本宪法派兵海外，五十来名“中核派”（他们也曾曾在机场阻止日本国家强权强制遣送张振海）在不可能获得游行许可的情况下，蒙上面具、穿着同种衣装在几辆装甲车和上百名警察的围堵下冲向大阪中心街梅田游行，抗议自卫队开向波斯湾。我们再次看出：只要国家政府的强权存在一天，国家权力必然对人类实行不平等的统治，人类就不可缺少无政府主义（或者叫“人权运动”、“社会改进事业”等等）的出于善良人性的反抗；强权（既存的法律、制度）彻底摧毁人性的一天，就是人类命运

的终结。这个无政府理想主义来源的人性就是“上帝意志”，所以我们说，除了“上帝意志”之外，不存在任何权威，如果基督降生在现代，他是一个当然的、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者。

受近代科学的启示，克鲁泡特金高举科学的演绎归纳法，甚至痛斥圣徒保罗（罗马帝国的公民）在罗马强权下向现实低头，曲解基督教义，胡说“奴隶要服从自己的主人”（《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第七章 社会的法律机能），同时也以实证数据的分析，探求人们从事分业（分工）的合理可能。克鲁泡特金高度赞扬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研究，称其为“反对国家干涉的斯图亚特学派”。1898年出版的《农园、工场与作坊》就是他的社会学论著，奠定了其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观。此书主要指出：近代经济学者们立于“地主、资本家等特权阶级从低廉劳动力那里赚取利润为基础”而讨论财富的增加，必然不问“应该生产什么？”，“怎样去生产？”这个大问题，那么人类由科学进步激起的幻想（例如不被终生束缚于一种体力劳动而可以每天用一半时间工作，可不断变换农园、工场、书斋、画坊等等）就永远没法实现。涉及到具体的产业，例如英国农业的衰退，就是由于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的不合理政策所致（例如把土地租给有钱人作为游猎场）；另外，克鲁泡特金也独具慧眼，对于被官权御用的经济学者们宣判了“死刑”的小生产、小工业也赋予在近代产业中的不可缺地位，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显得更加注目。

克鲁泡特金的亡命生活影响了他，使他主要在社会哲学方面从事论述，除了《互助论》，较有名的还有《法律与强权》、《诉诸与青年》、《面包与自由》、《法国大革命史》、《俄罗斯文学史》，但1903年于伦敦出版的《近代科学与无政府主义》无疑是他的代表作。克鲁泡特金再次表明：无政府主义不是少数英雄人物的梦想，而是存在与民众普通生活中的（尚没有形成制度的）道理，并且会永存于人类生活之中。在本文“一、无政府主义的起源”中，“科学家也不过是普通的人类一员，他们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许多人拿国家的薪水工作，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偏见，在大学里显然无法产生无政府主义运动。与别的社会主义、别的所有社会运动一样，无政府主义产生于民间，只要有民众运动，也只有在民众运动中，无政府主义的活力和创造性就（才）不会消失。”而所有既成社会制度产生的动力也来源于民众，“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为了使社会生存顺利可能，为了维护和平，为了调停纠纷，也为了互相协力扶助，做成了许多必要的制度。”这样，在任何时代中都存在着无政府主义与国家主义两种潮流，无政府主义代表了反抗少数统治集团，拥护创造了不成文制度的大众的创造力，“今天，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少数政治家做成的法律不抱任何希望而借助于近代科学技术和民众的创造力，努力于创建保障社会自由发展的新制度。.....我们经常看到：那些本来为了平等、和平、互助而产生的制度，连其中最善的部分，也作古成了化石。这些制度违背了其本来目的，成为少数野心家支配的工具，逐渐变成妨碍社会发展的东西。”在这种场合下，我们当然没法希望国家主义方面的良知来改进制度自身，只能由产生于民众运动的革命运动来改变。革命家常常有两种，我们一般看到的是为了自己获得权力、利益而在旧制度已经无法维系时冒出的权谋骗子，这些人或因掌握权力丧失人性，或因运动处于低潮而卖身求荣，疯狂为统治阶级充当打手。但我们在反抗罗马帝国的法律中产生的基督运动中无疑看到另一种不可能被出卖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在文艺复兴的佛罗伦萨，无政府主义再洗礼派运动（即后来的宗教改革的先驱，今天新教的理论发祥）、法国大革命中的无套裤汉、雅各宾党（这些人多被拿破仑利用去镇压过王党复辟）、直到今天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都表明了无政府主义的起源来自人类改进、制造所有的社会制度的大众的建设活动中。

本人是科学家的克鲁泡特金象拉普拉斯在《宇宙的体系》中推开上帝的假设一样，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形而上学理论和头疼的康德、黑格尔式先验命题、辩证法术语等一脚踢开，而偏好于产生于十八世纪英法哲学中的演绎、归纳法。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复辟蔓延于欧洲大陆时，在英国诞生了无政府主义近代理论的基础。实际上，正是依靠无政府社会主义的传播才把法国大革命的基本原理（人身解放、法律平等、代议制选举）燎原开来，并影响了俄罗斯农奴制的废除（1861年）和美国奴隶制度的灭亡（1862-63年）。与此同时，正是共和与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1848年革命）挽救了近代科学，把科学从权势的附属下解放出来。包括孔德的实证哲学（社

会学)、斯宾塞的综合社会学,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蒲鲁东在此基础上集大成,发展出基于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真正的个人自由,也是全人类共同自由的同义语:只有当无政府主义者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达到了自由,他才最终得到了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最大地发挥科学技术对人类福祉的贡献,才能排除在议会政治、国民普选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犯罪。

国家、国家,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如果要用一句来概括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历史、国家的本质,克鲁泡特金如是说:“所谓国家,就是由地主、将军、法官、僧侣、资本家、革命家、人民公仆等等结成的,用于强权支配民众、榨取贫穷大众财富的社会组织。”而无政府主义明确指出:所谓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际是依靠国家政治权力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经济剥削;所谓共产主义的一党专政体制是一小撮新兴统治集团在独占经济资源基础上对大多数人的政治压迫。所以,蒲鲁东在目睹 1848 年欧洲革命以来共和政府权力的犯罪后提倡由生产者、消费者联合成立的公共团体“法朗结”,其基础是利他式、互助式的个人自由。这是一种全人类性质的自由大同,当每一个人周围的人都达到了自由,他才会最终获得自由。现代社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组织、变革,才能生存、发展。<sup>44</sup>

克鲁泡特金主张进行一场无政府主义革命,以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他说:人类的精神若想从事于破坏的事业,对于破坏之后将来代替的制度,至少应先有一个轮廓的概念。首先,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和共产主义是人类长期以来所追求的两大理想,前者是理想的政治组织,后者是理想的经济制度,两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他指出:无论任何社会,只要废止了私有财产后,便不得不依著共产的无政府方向进行。由无政府主义生出共产制,由共产制达到无政府主义。两者都是近代社会中主要倾向的表现,既是对平等的追求。1878 年,克鲁泡特金在自己发表的第一个政治纲领中曾经肯定巴枯宁主义集体主义原则。两年后,他发现集体主义这个词已经过时,不能确切地表达未来社会的制度。

集体主义的涵义是集体财产,它无疑要比资本主义个人所有制先进,但仍然存在着一个集团与另一个集团争夺财富的可能性;同时个人占有生产资料也可能引起新的不平等,最后重新导致强权的出现。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概念,根据他的说明,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巴枯宁无政府集体主义的不同点在于:(1)把个人私有的财产转交给全体人民或整个社会,而不是交给集团所有;(2)劳动产品按每个地区的需要分配给全体居民,而不是按每个人所耗工时与所完成的工作种类付给报酬。其次,他强调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不是政治上的夺权行动,因为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主张在推翻旧政权之后建立一个新政权。

在他看来,在建立理想社会之前,需要夺取剥削阶级的土地及其生产资料,但这种剥夺必须是群众的自发行动,而不是出自一个代表自己利益行事的新政权法令。同时,必须将剥夺这个词只限于整个社会(即乡村、城市等等)所采取的对土地、工厂、住宅等实行的那种暴力回收的行动,以利于整个乡、市、省或全国人民,而不是用来表示私人的或集体的没收财产行动。

再次,克鲁泡特金指出,建立在自由协议基础上的城乡各自有公社的联合,是符合人类互助本性的一种制度,也是无政府社会的基本结构。他说,人类发展的趋势正在把政府的干涉减至零,主要就是要消灭不公道、压制、独占三者化身的国家。

在国家被废除之后,出现的将是根据自由合意原则组织起来的公社和自制生产团体的自由联盟。每个公社的成员都是自由平等的,有集体决定一切事物,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通过由各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定期召开的或就实际生活提出的某个问题特别会议来取得,会议的各项决议对于各集团来说不是必须遵守的,他们可以赞成,也可以否决。

他特别指出,这种联系不能透过由事先选出来管理联邦各项事务的常设委员会的途径取得,因为这种常设委员会如同政府一样,总是企图成为进步发展的障碍。

---

<sup>44</sup> 引用到此结束。

## 第五章：独立思考之基本问题

在我们讲各种理性、自由、民主和独立的问题之前，我首先要说明一点。我们是人，不是畜生。如果执意要鼓吹什么正确统治，什么人民的统治（我前面也说过这是不可能的），而心甘情愿的去鼓吹被压迫的论调，那和把自己当做畜生一样对待有什么区别？

而为了突破被国家所欺瞒的现象，作者觉得有必要向读者们讲述一下什么是舆论的封锁，如何试着去打破国家对我们的洗脑。

### 1. 冲破媒体洗脑之禁锢

相信正在读着这篇短文的读着您一定听过一句话：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这个“自古以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清朝的领土来看吗？

历史上，中国的中央政府真正对台湾施行有效管辖是清康熙二十二年，西元 1683 年收复台湾开始，直到失去管辖权的 1895 年马关条约签订至今。也就是说，满打满算中国的中央政府真正控制台湾也只有 212 年而已。又谈何“自古以来”呢？另外，康熙收复台湾，所收复的也只是台南几县之地，并没有形成有效统治。台湾大部分地区依旧是由原住民所把持，从这一层面来说，也更不存在什么“自古以来”了。不过我要讲清楚，我并不鼓吹民族的分裂，我支持两岸的团结合一，只不过我是站在人民的角度，而不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做嫁衣。

并且，如果是从清朝有效管辖的区域来看的话，那么为什么黑龙江以外的外东北，外蒙古，今天归属中亚地区的部分领土，西藏以外等等的领土，就不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况且，外东北地区可是满族人的故乡啊！

问题绝不仅仅只是民族归属的问题，这涉及到更加深刻的政治问题。

一切的农耕文明都免不了有一种“嗜土性”，即这个国家对土地有着近乎疯狂的热爱。这是因为农耕文明赖以生存的方式只有农业，而没有土地，就无法开展农业生产。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欧洲国家在近代屈辱史时，对于土地就没有那么大的欲望。

对于大陆的经济来说，台湾的地位是何等重要！当今的中国，正经历着一个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过渡阶段，经济成倍的增长，似乎给了人民一种错觉，即其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势头都不如中国的迅猛。这其实就是本节要谈到的主题了，一个国家的舆论控制到底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在生活当中，人们总能接触到或多或少的思想灌输，不论是街边的一横条幅，还是一片宣传板。当局怎能不知中国经历的不过只是其他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阶段，但他们不过只是有意识的对人民进行灌输。就捡当今国内互联网最常见的论调来说吧！他们说台湾的经济停滞不前，一塌糊涂；而大陆的经济却是日日腾飞，财源广进。虽然我们无法否定的确如此，但他们却不可挽回的都犯了同一个错误。他们只是片面的在谈当下，却不提过去。谈经济应该用阶段的形式，而不能仅仅看眼前。中国大陆现在所经历的，正是台湾在 80 年代经历过的阶段。在那时，台湾被称为世界工厂，廉价的工业品远销全球。这就像是刚进入游戏的菜鸟对于老鸟说：“我现在每天都能升 2 级，而你半个月才升一级”。

明明本应该是非常简单的思考方式，当局却有意识地不告诉民众，为的就是让民众讨厌台湾当局，而鼓吹大陆当局。这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如果老百姓全都会独立思考了，那谁还替他们卖命？

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下新闻媒体的问题。稍对世界历史有了解的人们都应该知道，人类的近代史是淋满了鲜血的。不论是工业革命中对于新生无产阶级的残酷压榨，还是大航海时代的三角奴隶贸易，或者是殖民扩张过程中白人对于美洲原住民的屠杀。同样的事情也一样发生在海峡两岸。台湾曾经施行长达 37 年的“戒严令”，是世界上执行了最长时间的戒严。大陆也经历了文革、六四等

等血腥践踏人民自由平等权利的大动乱。类似的反人类的事情，在智利、在韩国也都曾发生过。但很奇怪的是，不论是韩国、台湾、智利，在当下都不再封锁对那时的舆论，并不阻碍人们去搜索、议论。而中国却采取限制与打压的方式。有的说法说：这是为了保护人民。这种明显本末倒置的说法根本不能使一个头脑健全的人相信。难道说不让人民了解民主自由，不让人民去追求更好的社会，就叫做保护吗？！难道说，对于追求自由的民众大肆屠杀，就是你们所说的保护吗？！幸德秋水先生也说过：“古来，苟求社会之进步，希改革之议论运动，无一不多少寓于破坏之手段，夫唯云以寓破坏之手段而全然置罪，凡天下为以新代旧之事者，何人能免？”

在现代化如火如荼的发展的今天，我们难道真的不应该认真思考一下，政府限制这类言论，到底是因为想要保护我们，还是简简单单的不想让我们知道太多？我们追求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的形象早已经被诸多强权所扭曲破坏，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始终要明白，社会主义是为人民存在的，不是为了官老爷存在的。而官老爷永远也不想给泥腿子办什么好事。

思想钳制的影响绝不仅仅只在于此。它更多的是影响了人们对于平等、自由、博爱的追求。这些本来应该是人类普世追求的美好价值观，却被当局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好像一个人就只能追求被别人所统治一样，或者说，只要是追求自由平等，就都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人。我们本应该更多些理性的思考。而不是跟着政府、跟着国家的说法一路撞南墙。

当然，人各有志，我不强求某些人推崇独立思考。他们作为压迫者、作为帮凶和工贼，或者说他们作为弱智，当然不希望泥腿子的思想解放。

## 2. 鉴别谣言与骗局

上节我们讲清了宣传的恶毒，这节我们就必须讲讲怎么鉴别各种骗人的论调。当然，有些骗局是能够以假乱真的，虽然在短时间内很难突破这类高水平的欺骗，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几个简单的小办法来验证，至少能够避开错漏百出的骗局。

### 排除钓鱼行为

首先当然要看这个论调里面有没有明显的逻辑缺陷和事实错误，有些人出发点本就是钓鱼，而不是为了科普和骗人，你一证证明你是个沙雕，结果他笑的很开心。

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帖子，声称国民政府于 1946 年 2 月 29 日，为了收复外蒙古而派出百万大军，和苏联的三个方面军打的鲜血淋漓。

您想想，1946 年可能有 2 月 29 日吗？

还有什么著名的“931 海战”，居然还有人信，九月有三十一号吗？

### 看消息的来源

标题党，什么震惊、吓尿了……等等标题，不是谣言就是断章取义、歪曲事实。首先要看资料的来源是哪，现在国内许多的新闻媒体都是相互传谣，你从我这抄，我在你那抄，抄来抄去就变成了谣言大赛，更可怕的是每天浸泡在这种谣言当中的普通人是最容易相信的，也正应了希特勒的那句话：“谎言重复一万次，就成了真理”。

更有甚者，通过歪曲的截屏与遮挡，断章取义，言之凿凿，这是不可信的。最为重要的问题首先要考证消息的来源，确定消息的真实性，而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 交叉对比

一个消息如果想要确凿，最好要有两个以上的相互独立的消息来源。在历史研究上也都注重“孤证不立”，一件事情如果只有一个消息来源，那么就极有可能是骗人的。而且这两个消息来源最好是一二级来源。什么是一二级来源？一级来源就是一手资料与文献，二级来源就是对于一级来源的验证，评判，整理，摘要。而总结归纳是三级来源，新闻媒体恰恰是三级来源，因此造假和欺骗也



是十分简单的。

### 放下自己的立场

如果想要直视事实，得到客观的看法，就必须要有直面事实的勇气，而不是看到自己不愿意听的就百般抵赖，撒泼耍赖。客观与否对于某些人来说是非常主观的，这要受到从小的教育背景、接触的媒体和周遭人所带来的观念的影响。重要的是，不要听到不喜欢的论调就骂人家是傻逼，所谓客观就是抛开自己的政治立场、信仰、国籍还有性别，接受各种各样的信息，并且凭借自身的理性去进行判断。并不是听到你想听的就说是客观，不喜欢的就叫不客观。

如果你想听客观的言论，你就要有接受事实的本钱。

### 推倒民族的隔阂

近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媒体都喜欢呼风唤雨，煽动民族之间的仇恨，我就不点名了。究其根本，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外国人民并没有任何区别。正如同我们国民遭受到的种种压制与洗脑，外国的人民也饱受国家制度的摧残。在两个奴隶都遭受奴隶主的虐待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再起内讧。对于一个快要饿死的人，而你手中正有着食物，难道你会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而眼睁睁的看着他饿死吗？

## 3. 生而自由的权利<sup>45</sup>

人生而是自由的，却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枷锁当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当人们被迫服从于强权的时候，他们做得对；但是，当人民有能力打破自身的桎梏的时候去打破它，他们就做的更对。因为人民正是依靠别人剥夺他们自由时所依据的那种权利，来重新获得自己的自由，所以人民就有权利重新获得自己的自由，否则别人当初来剥夺他们的权利的时候，就成了毫无理由的了。

人所共有的自由，是人性的产物。人的首要法则是要首先让自己活下去，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当一个人一旦达到了有理智的年龄，可以自己判断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时候，他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变成了自己的主人。

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然而孩子也只有需要在需要父亲养育的时候，才依附于父亲。这种需要一旦停止，自然的联系也就解体。孩子解除了他们对于父亲应有的服从，父亲解除了他们对于孩子应有的照顾以后，双方就都同等地恢复了独立状态。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志愿的了；这时，家庭本身就只能靠约定来维系。

因此，我们不妨认为家庭是政治社会的原始模型：首领就是父亲的影子，人民就是孩子的影子；并且每个人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转让自己的自由。区别就在于，在家庭里，父子之间的爱就足以报偿父亲对于孩子的关怀了。但是在国家里，首领对于人民显然没有这种真情的爱，因此对人发号施令的乐趣就取而代之。这样，人类就被分成一群群的牛羊，牧羊人保护他们，就是为了以后更方便的吃掉他们。

即使是最强者也绝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由此就得出了最强者的权利。这种权利表面上看来像是讥讽，但实际上已经被确定为一种原则了。可是，难道人们就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吗？强力是一种物理的力量，我看不出强力的作用可以产生什么道德。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它最多也不过是一种明智的行为而已。在何种意义上，它才可能是一种义务呢？姑且假设有这种所谓的权利。我认为其结果也不外乎是产生一种无法自圆的胡说。因为只要形成权利的是强力，结果就会随原因而改变；于是，凡是凌驾于前一种强力之上的强力，也就接替了它的权利。只要人们不服从而能不

---

<sup>45</sup> 本节的摘要来自于《社会契约论》第一卷。

受惩罚，人们就可以合法地不再服从；而且，既然最强者总是有理的，所以问题就只在于怎样做才能使自己成为最强者。然而这种随强力的终止便告消灭的权利，又算是一种什么权利呢？如果必须用强力使人服从，人们就无须根据义务而服从了；因而，只要人们不再是被迫服从时，他们也就不再有服从的义务。可见权利一词，并没有给强力增添任何新东西；它在这里完全没有任何意义。

你应该服从权力。如果这就是说，应该向强力屈服，那么这条诫命虽然很好，却是多余的；我可以担保它永远都不会被人破坏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这一点我承认：可是一切疾病也都来自上帝。难道这就是说，应该禁止人去请医生吗？假如强盗在森林的角落里劫住了我，不仅是由于强力我必得把钱包交出来，而且如果我藏起钱包来，我在良心上不是也要不得不把它交出来吗？因为毕竟强盗拿着的手枪也是一种权力啊。

那么就让我们承认：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

有人说，专制主可以为他的臣民确保国内太平。就算是这样；但如果专制主的野心所引起的战争，如果专制主无餍的贪求，如果官吏的骚扰，这一切之为害人民更有甚于人民之间的纠纷的话，那么人民从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呢？如果这种太平的本身就是人民的一种灾难，那么人民从这里又能得到什么呢？监狱里的生活也很太平，难道这就足以证明监狱里面也很不错吗？

纵使每个人可以转让其自身，他也不能转让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生来就是人，并且是自由的。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加以处置。

但要让一个专制政府变得合法，就必须让每一代人民都做主来决定承认它还是否定它。但这样一来，这个政府也不可能是专制的了。

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义务。

#### 4. 生而平等的权利<sup>46</sup>

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即将结束的不平等世界和一个即将开始的平等世界。——皮埃尔·勒鲁

这个词体现了整个一门科学，一门至今还模期不请，被黑暗所包围的科学，社会的起源和目的就隐藏在这个词里。但是在政治用语中这个词仍不失为其余两个词存在的理由。你们问我为什么我要获得自由，如果我回答说我需要自由，如果我向你们说我具有表现自己的本能天性和愿望，或者简单地说，我要生活，这显然是不够的；你们可以用你们自身同样的本能，用你们这方面所拥有的同样无限的权利来反驳我；并由此引起对抗、冲突、战争、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这是大地献给苍天的永远凄惨的景象。只要智慧不介入，不表态。那么权利就只不过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萌芽，它只是潜伏地存在着。只有智慧才能把它表达出来，并公开宣布它的存在。因此，**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要获得自由，我会回答你们说：因为我有这个权利；而我之所以有这种权利，乃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同样，如果我承认仁慈和博爱都是人在社会上的天职，那是因为我思想上考虑到人的本性原是平等的。

你们提出地球上到处都是不平等的现实情况来反驳我，那是徒劳的。确实如此，不平等统治着地球的各个角落；我们也可以上溯到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从中找到不平等现象，而消灭这种现象的那一天也许还非常遥远。这有什么关系呢？人类的思想已经超越不平等所带来的贫困和罪恶的堕落，并设想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然后，像寄托于真和美的永恒源泉一样，人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上帝。有人说：虽然我很软弱，我却设想一个平等的世界，这个世界也应是上帝乐意的世界；它早在上帝心里预先设想好了，原先它本出于上帝之手。不管我们来自某一伊甸国、某一天国，或某个美好的世界；也不管这个世界只是存在于上帝心里和我们的心灵里，它从未得到实现；尽管迄今唯一组成过的平等世界只有从前大自然萌芽状态的世界，当时人类还处于与野兽很接近的原始

<sup>46</sup> 本节摘自皮埃尔·勒鲁《论平等》第一部分第一章。

野蛮状态，我们仍有更充分的理由说，平等是自然万物的萌芽，它出现在不平等之前，但它将会推翻不平等，取代不平等。这样，从社会的起源和终止这两方面来看，人类精神统治着现实社会，并把平等作为社会的准则和理想。

如果说，我再一次相信自由，这是因为我相信平等；我之所以设想一个人人自由，并像兄弟一般相处的政治社会，则是由于我设想了一个由人类平等的信条所统治着的社会。

## 5. 破坏主义乎？乱民乎？<sup>47</sup>

善良的人被当成恶党，人人都拿起武器跃跃欲试。今天我们的国民对于社会主义者的态度就是这样啊！这些人往往都没有追究过真相，单单靠着看惯、听惯了的，就泛泛地说：社会主义是破坏主义，社会党是一帮乱民。就像忌惮瘟疫和蛇蝎一样。呜呼！这些人真的是破坏主义吗？他们真的是一群乱民吗？

从古至今，凡是追求社会进步，希望社会改革的运动，没有一样不是多少靠破坏手段的。就仅靠他们用破坏的手段来治罪，那天下致力于用新的代替旧的的人，谁能够免罪？真是奇怪啊。换到人的视角来吧，你家的房屋朽废了，应该改建；你的衣服和帽子都被尘土污染了，应该洗干净。那但凡是这么说的，不都是破坏主义，不都是乱民吗？

然而冥顽不化、害怕任何变化的人，怯懦一时想要苟安的人，他们厌恶进步和改革的程度，只要遇到一个呼吁新主义的人，就直接骂他们是破坏主义，叫他们乱民。如果不尝试千方百计的破坏则决不罢休，这也是古今东西方的宰相们不约而同的。以前，尊王讨幕的理论出现了，幕府的有司用破坏主义打压他们，把呼号倒幕的人视作乱民迫害，导致了安政时期疑狱的悲惨可以和秦始皇时代并驾齐驱；以前，自由民权的学说兴起了，藩阀的有司骂他们是破坏主义，把呼号自由的人当做乱民迫害，导致了保安条例发布的暴横可以和纳翁三世时代并驾齐驱。但看日本国民今天能够摆脱封建阶级的桎梏，进入四民平等的社会，放弃专政压迫主义，以立宪代以代之，国家的威严和光明在东海上闪耀，这难道不是当时被称作破坏主义、被称作乱民的那群人所倡导的吗？

世间新主义的运动，都只不过一时被称作破坏主义和乱民。但其性质，难道不是社会进步和改革所急需的吗？当时的民众仅仅依靠耳听目睹惯了的言论，就如同大水决堤一般迫害攻击，最难奈何的正是这些人。宗教改革的时候是这样，日莲宗萌发的时候是这样，欧洲大陆自由制度的建立是这样，选举区改正案的时候是这样，废奴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不仅俗人俗论的攻击迫害是没办法奈何的，但随着这种论调越发猖獗，反动势力也就越发猖狂。他们急忙的追求成功，他们的势力也是这样，更有甚者则会发生惨害的事情，这是路易身首异处的原因，也是梅特涅被驱逐的原因，真是寒心至极啊！

我们当然可以暂时正论社会主义本质的性质在今天到底是不是社会的急务，然而在欧美两洲的处处血腥镇压之下，他们势力的发展如同直邮的命令、如同雨后春笋的迹象。而我们国民当中冥顽不化的，叫这些人破坏主义、叫他们乱民。想要怯懦苟安的人也随声附和，对这些人的反驳就显来越来越无力了，以致于今天我们为了解释劳动问题而四处奔走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避讳的说，如果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就肯定不能的到中上层社会的同情。这也是运动困难到这个地步的原因。这样一来，因为他们的攻击、憎恶和忌惮，导致了有关社会主义真相的一丝一毫也不能传播。但这些人本质也仅仅只有无知、冥顽和苟安罢了。社会主义真的表现出了社会的走向吗？虽然它的传播不应该受到防备和遏制，但是这些人所说的言论，难道不是一个文明国家国民的耻辱吗？我真切的希望我们国民在憎恶和迫害之前，先深刻的研究了解一下。

---

<sup>47</sup> 选自《秋水文集》龙吟社，明治社会主义文献丛书，1947版，本译文已经获得译者的授权。

## 6. 无需热爱国家

虽然我还想再说一些前提，但我又想到，如果不是真心想要学习安那其主义的，是不会看到这两节的。因此我不必再说其他任何废话了，在这本小册子马上就结束的时候，我对读者表示感谢。

开始我们最后的主题吧，不要对国家抱有任何感情。我们跟着一个思维走吧。首先，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压迫的工具。国家是干什么的？国家是为了压迫国内和国外的人民的。国家带来了什么？明目张胆的剥削、血腥的镇压和战争，还有动荡不堪的社会。谁养着国家？无数的劳动人民供养国家和官吏。

读者您明白了么？作者我的思维很简单，人该活着还活着，国家没了地球照样转。切不可被国家主义的媒体宣传迷了眼睛！它从未给予过什么，而所做的仅仅只有掠夺。我想会有人对我说：“这样一个安稳的环境，难道不是国家所创造出来的吗？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唉，朋友，你为什么不想想，类似中东那种战乱，又是什么东西造成的呢？社会哪里安稳了？这是鼠目寸光。遮天蔽日的剥削和压迫就是所谓的安稳吗？尘肺工人和工难死的工人怎么回事呢？资本家和国家怎么就不施舍一点呢？或者你想说，所谓安稳是指国内没有战争？那遮天蔽日的排外情绪和战争宣传又算什么呢？几千枚导弹对准台湾人又算什么呢？明明口口声声说台湾人是同胞？莫不成你是想论证杀人未遂就不算犯罪？

还有的人说生活的幸福是国家给予的，这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首先要问，是国家领导人代替你的父母去工作挣钱养你的吗？还是说那些官僚请你吃过一顿饭？或者说，你是体制内的人（这样我就没必要跟你废话了）？首先，你的父母工作，难道不是他们工作着去养官僚吗？而官僚去干什么呢？是摆弄文件吗？好吧，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蒲鲁东先生早已经说明白过所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了。从来也没有这种对立，只有冠冕堂皇的为压迫洗白而已。难道有一个人，他的工作是完全不需要体力的吗，或者说这个搬运工人，这个技工，他的体力劳动是完全不需要大脑参与的吗？首先说说中世纪的工匠吧，没有机器的参与，他们的体力劳动，难道不需要长时间工作积累出来的经验和技巧吗？这算不算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呢？换到工业时代来，这个机器工人，他的工作就不需要对机器的了解和知识吗？他就不需要学习如何去使用机器吗？这难道不也是脑力和体力的统一吗？再换到公务员上面来，他们就算整天对着文件摆弄来摆弄去，就不需要丝毫的体力吗？他需不需要四处走动去工作呢？他就不需要做哪怕一丁点使用体力的行为吗？就算是国家领导人，也必然需要二者的统一。所以说蒲鲁东先生说，从来也没有这种对立，这个结论是十分正确的。

既然是他们剥削工人才能够赖以生存，我想他们也没什么必要存在啊，难道有一个人会因为自己身上长了寄生虫而夸夸其谈、沾沾自喜？好吧，不是还有什么所谓公益的工程不是吗？但是我们再想想，这些工程是谁建起来的呢？又是谁提供了资金呢？资金是哪里来的？劳动人民身上诈取出来的。那么又是谁当工人去工作的呢？还是劳动人民吧？那么这又和官僚有什么必然联系呢？难道说人民就不能自发的去建一些工程吗？换到官僚层面，每次有了工程，他们免不了要发一笔小财。而对于公益，也缺乏兴趣。这难道就是爱国吗？况且，被雇佣的工人在进行所谓公益工程的时候，又被官僚给剥削了一笔。

更何况，任何国家难道一次都没有经历过动乱吗？这个动乱又是什么东西整出来的呢？是劳动人民吗？劳动人民闲的没事做了要打仗？还是劳动人民吃饱了撑的要文化大革命？收起你的国家主义言论吧！只有愚蠢的人才会爱国，因为国家就是你们的夜壶，你们有了什么破事，都要拿国家出来道德绑架，免得别人看出来你令人作呕的本质！我们安那其主义者，公然的表示，国家就是压迫，作为革命者，我们首先要革自己国家的命，之后还要帮助其他国民革他们国家的命！正如巴枯宁先生说：“俄国社会革命党人首先力图彻底摧毁我们的国家，坚信只要存在着国家制度，不管它采取

什么形式，都必然压迫我国人民，人民就必然是一贫如洗的奴隶。”

还有什么卫国战争，放你妈的屁！为谁的国？为谁而死？为希特勒死？为斯大林死？还是为资本家？为了工贼？为了官僚？还是为了你可以继续在体制内吃里扒外而死？你自己怎么不去死啊？天天鼓吹什么战争，说战争打响了，我首先捐一个月工资。

原来我国国民的觉悟都已经这么高了啊，作为中国人，我可真自豪啊！那我倒要看看，贫困山区的孩子们饿的皮包骨，有几个给他们捐过一分钱吗？别说一个月的工资，怕是一百块钱都舍不得拿出来吧！在路上，碰到一个乞丐，有谁肯花十块钱给他买碗面条吃吗？笑话，爱国？你只是爱放屁罢了！为国而死？哈哈哈哈哈！<sup>48</sup>

## 7. 打翻个人崇拜

好吧，我们再来说说个人崇拜。

作者发现，新中国似乎一直都有个人崇拜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从毛泽东时代流传下来的，毛泽东生前就大搞特搞个人崇拜，死后更是被他的信徒吹上了天。

首先吧，个人崇拜这事本来就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发生的每件事都是必然的。“假如没有毛泽东，历史也会产生张泽东、王泽东、李泽东……”但毛派们似乎并不认同这个说法，因为毛主席就是神仙，一切的功绩都是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这不是自己砸马克思的招牌吗？

进一步来说，个人崇拜除了粉饰太平和维护统治之外毫无用处。就算在干活的时候到处贴满最高指示，又有什么用？伟大领袖说一句话事情就办成了吗？而且不断地复读弄得人们像个傻子弱智一样。明明现在的人都看得清朝鲜的问题，怎么换到自己身上就不认识了呢？还是说是故意不承认？这些信徒可能又要搬出什么“修正主义”什么“背叛人民”……不过这样就多说无益了，追寻你的真理就好。

作者明白为了做某件事情，偶像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个人崇拜想做的事，塑造这么一个伟大的形象，除了统治人民之外还有什么可能呢？至于什么革命造反派……唉，当权者并没有改变，该统治还是统治，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最可气的，在冠状病毒肆虐的时候，有些人竟然又把毛泽东给搬出来了，又把最高指示抬上舞台。甚至把作者给气笑了，这有一丝一毫的意义吗？这除了暴露智商水平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作用吗？不过，也能证明，个人崇拜的洗脑会把一个人降智到什么程度……

好吧，看看斯大林是怎么做的吧。

20世纪30年代初，斯大林战胜了反对派之后，大权独揽，作为党的总书记，他这个时候必须要巩固自己的权力。首先要在关键部门安插亲信，首先让伏罗希洛夫掌握指挥红军，让雅哥达<sup>49</sup>掌握安全机构和宣传机器，把任何功绩都和斯大林联系在一起。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国内都出现了近乎迷信的个人崇拜现象，斯大林简直成为了人民眼中的神明。一切成绩的取得都要归于斯大林同志。29年12月，斯大林五十大寿，苏联为斯大林的生日举办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报纸上出现了对伟大、天才导师和领袖的祝贺，原来被击败的反对派也参加了对他歌功颂德的大合唱当中去了。比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一个接一个发表文章，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还大谈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是如何正确。

苏共十七大上，斯大林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在发言时，二十二次提到斯大林，他还为斯大林创造了好几个新的专有名词，比如：伟大社会主义的建设掌舵人、争取劳动人民解放的伟大战略家……

---

<sup>48</sup> 作者当然不是想否定被侵略战争中抵抗的正确性。只不过，要分清我们是在为谁做嫁衣。

<sup>49</sup> 苏联内务部三魔头，即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值得一提的是，叶若夫被处决的罪名是镇压苏联人民，而他却是肃反运动中斯大林的钦定刽子手。

甚至提出要把斯大林总结报告的所有论点和结论当做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

我就介绍到这吧，有脑子都人都看懂了。作者也不需要为读者们再废话什么了，最后再次向看到这里的读者致谢。这本小册子到此也就结束了。

## 附：怎样才能发动民众<sup>50</sup>

动员全国的财力人力需要民众，军队前进作战固需要民众之援助，即军队后退亦需要民众之援助，救济伤兵，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无一不需要民众的力量，如果我们还不曾忘记阿比西利亚皇帝曾因单靠军队不发动民众而失败的教训，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民众——主要的是参加生产的工农民众——这是无可怀疑的事。即在敌人也懂得这个。在芦沟桥事变发生时，上海的日本报纸曾替告他们的政府说：“日本军队战胜中国军队，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全中国的民众真的起来作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这便不是武力可以解决的了，政府应于此点深加注意”云云。

开战以来，无论政府党或在野党，都异口同声的说要发动民众，公开说不需要民众的人，只是极少数。并且“全民抗战”这句话，成了一切刊物上的套语；实际上如果允许我说句老实话，完全没有这回事。所以空喊发动民众，喊破了喉咙，民众也不会有多大的回声，要民众起来，必须考虑到怎样才能发动民众。

我们须知：民众是有高度意识和意志的人类，不像牛马可以随着鞭子的声影，叫他们行就行，叫他们止就止的；更不是无意识的木石或粉团，人们要把他们做成什么东西就成为什么东西；所以无论政府的命令或政党的空口宣传，都同样没有发动民众的万能。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

第一 必须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学生因为每日上课七八小时，尚且无法参加抗日工作，工人每日做工十二小时或十三小时，连星期日都不得休息，无论做日工或夜工，下了工疲乏得成了半死人，更没有担任抗日工作的可能了。农民耕地不足，衣食已很艰难，又加之以高租高利苛捐杂税以及种种征发、敲诈，压迫得他们不能活命，他们眼前的敌人是贪官污吏、地主、土劣、保甲长，而不是日本军队，终年过这样痛苦生活的农民，怎样会有抗日的情绪。参加生产的工人农民，是最可靠最有力的民众，绝非无业游民可比，而且他们占全国人民之最大多数，他们不能起来抗日，还能发动什么广大的民众呢？此外苛捐杂税，向下层人民强派公债和裁员减薪，也足以减杀小商人小职员的抗日情绪；学生功课太繁忙，也没有做抗日工作的时间。所以坐在沙发椅上，责备民众不爱国，不起来抗日的人们，简直和说“百姓无饭吃何不食肉糜”的昏皇帝是一样的货色！

第二 必须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组织是一种力量，一切生物皆由无数细胞组织而成，细胞无力量，由无数细胞组织成各种器官，组织成各种生物，才发生各种力量；一盘散沙的民众也自然没有力量，民众有了组织，而且是经常的组织，不是乌合之众，便会发生伟大的力量。民众自身的痛苦解除了，然后才谈得上组织，也只有为解决自身的痛苦，民众才会迫切需要组织，并且解决痛苦之真的实现，还是要靠民众自己的组织力量。所以要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必须立即恢复并充实由各业民众自己选举的自己的工会、学生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等。官办的招牌的没有民众的民众团体，在抗战中，除了禀承上官命令发几个通电以外，是不会有力量量的。

第三 必须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如果人民有了组织而没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他们的组织力量，只会用于解决他们自身的痛苦上面，而不能用于政治，抗日乃是一种政治斗争。人类是政治动物，人民必须有政治的自由才算得是自由民，是国民，而不是被征服的奴隶，奴隶是不会爱国的，奴隶是不会自动的为国家民族利益而舍命斗争的。在数千年专制政治之下，过着没有组织没有政治自由的痛苦生活，对于统治者，老是抱定“抚我者后，虐我者仇”的见解，国家与民族观念，在我们的头脑中，仿佛是一种奢侈品。所以现在要叫人民爱国，要叫人民起来为国家民族利益积极的对日抗战，不但要解决人民自身的痛苦，不但要让人民有自己的组织，尤

---

<sup>50</sup> 陈独秀：《我对于抗战的意见》。1938年2月亚东图书馆印行。

其要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使人民自己真能感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自身的利益与国家休戚相关，这件事决不是政府的命令和宣传教育所能够代替的。

如果我们切切实实做到上述这三件事，发动民众当然不成问题。或者有人认为这样未免太发动了，我则以为没有这样的“太发动”，是不能够抵抗站在我们眼前凶恶而有力的敌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和发动民众有关，就是政党领导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在发动民众运动中政党领导的作用，一国中有几个政党存在着，便必然发生政党间争取领导民众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欧美各国及日本，从来并不感觉有什么严重，无论在平时或战时，因为他们的政府党及在野党，都用发表政纲和公开的讲演，争取民众到自己党的方面来；各党在民众团体中亦各有分野，各自争取群众，争取在团体中的领导权，无论党争如何剧烈，从未想像到根本不容许他党争取群众，争取领导权。至于近年以来，有几个国家发生了一党专政的怪现状，根本不容许他党存在，这便根本没有什么政党间争取民众争取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谁都不能说现行的政制是法西斯主义专政或共产主义专政，当然应该容许有党派间争取民众的问题，并且可用先进的民治国家的所通行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并不特别严重。尤其是在民族危急存亡的今天，各党各派合作救亡的呼声，遍于全国，只要能够发动民众起来抗战，谁愈多尽点力愈好，在野党固义不容辞，政府党亦无所用其疑忌，在野党仅仅有了若干民众拥护，并不就能够夺取政权。并且政府党如果毅然决然采用上述三种办法发动民众，别的党派能够采用更激进的纲领，争取得更多的民众，这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即令抗日的纲领不同，政党间遵循各国通行的办法，各据自己的纲领及政策，努力宣传，一任民众之从违，以争取民众，这正能够推动政治进步和提高民众之政治水平；倘然以为这样太过民主了，而采取不正当的甚至极卑劣的手段抢夺民众，如用武装打手和金钱来威迫利诱民众，复拿民众做自己的打手；造谣诬蔑对方，企图一党垄断；利用政治势力，利用民众落后意识，甚至以党员冒充民众压迫对方；政党间，甚至一党中各小派别间，如此这般非政治的无原则的强拉硬夺，不仅不能发动民众，还会使已起来的民众失望灰心而消极。大家如果不赶快觉悟，如果一直采用这样的手段争取民众，我包管各党各派将得不着一个民众；其结果不是各政党领导民众抵抗敌人，而是敌人领导着汉奸灭亡中国！

## 后记

是恋物癖般地热爱大自然，对作战的网络修修补补，绝望地立刻做些什么；  
还是麻木地接受组织的控制，对阶级的指挥棒唯命是从，绝望地再等一阵子。

是以天堂为名义，将当下的生活和体验暂时悬置，然而天堂离我们越来越远，以至于看起来更像地狱：

还是行尸走肉一般得过且过，以为只要多种些胡萝卜，便足以让我们脱离这场恶梦。

多么困窘的选择！

在地铁里，我们再也看不到令人局促不安的荧幕、如往常般妨碍行人的动作。陌生的人们彼此倾谈，不再互相攻击。同志们正在街角密商。大街上有更大的集会，正在进行严肃的讨论。一个又一个的城市中，攻击正在展开。新的兵营被掠夺，继之焚毁。被逐出的公寓住户不再和市政府协商——他们直接进驻。一场清醒的发作中，一位公司经理在会议中途，杀了他为数不多的同事。文件外泄，内容包含了所有警察、宪兵的私人住址，导致了一波史无前例的剧烈大风吹。在乡下的老杂货铺和酒吧，我们将生产的多余产品带去，并取走我们缺乏的东西。我们也聚在一起讨论情势、以及机械工作室里需要什么设备。广播电台不断地向反抗者报告政府武力的撤退状况。一枚火箭破开了克莱沃（Clairvaux）监狱的围墙。已经不可能确切地说究竟在「事件」开始之后，究竟过去了几个月还是几年。首相呼吁冷静，看来却无比孤单。

普遍的动乱局面，要如何变成革命的形势？警察持续地败北，而一旦街头被我们占夺，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国会值得我们一直去袭击攻占吗？下放权力到地方的意义是什么？如何抉择？如何存活下去？

## 如何重新上路？